

第四章 台灣國族認同的論證

後殖民理論認為殖民時代的結束為受殖地區所帶來的結果是雙重的，一面是重獲新生的喜悅，另一面卻是不自而然的殖民者複製。這種「複製形式的新生」反應了歷史的連續性與必然性，難以掙脫殖民者的道德信念及價值體系作為基礎的「敘事型態」(narrations)，尤其是政治及文化認同的框架，因而一個完全沒有中國經驗但受國民黨政權教化的台灣人，竟然和 1947 年以後隨國民黨政權來台的外省人，在中國想像及原鄉情懷的層面產生深刻的聯結，但在同一個時間點，卻和自己父母的歷史有了斷裂。因此，我們不禁懷疑在「國族認同是國家認定中最具強烈排他性的政治論題」中，這種強烈排他性指向怎樣的論述起點，是統治階級的霸權領導，還是底層人民的族裔天性，其中，「國族認同」是否存在受殖的「因果關係」或「果因脈絡」抑或另外面向的反殖暴力或解殖罪惡等問題需要思考，而兩造之間對於「祖國」或「家國」的敘事，是否帶有建立新型態國家的「遺忘」(forget)與「健忘」(amnesia)特質，亦須在論證過程有所關注，因為這種對於特定族裔歷史的遺忘，在 Ernest Renan 的視見中是一種國族霸權為存續特定國族的重要動能，尤其是凝聚群體過去榮光與國族傳統共識，運作「生命共同體」或「想像的國族社群」的基礎，隱含一種人類只能透過他人或是特定團體的承認獲得認同的必然性與必要性，亦有主奴意識的霸權性、殖民性與壓迫性，而健忘在後殖民理論解釋，除了部分原因是遺忘的妥協或屈服外，更具有驅散殖民統治的痛苦記憶及文化優劣的種族屈辱目的，亦即如果每個自我的面前，都有另一個強烈的、先驗的自我，自我在該整體的結構只有透過這樣的「成熟模式」，確保其身份認同的正當性與合理性，甚至是政治認同的啓蒙性與文明性，甚而，一個本省籍、客家籍或原住民籍的台灣人，在國民黨政權假文明建制之名的多元文化主義下，產生了否定自我、痛恨自我但也崇拜自我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與「雙重身份」，分不清「自我」是種族、民族、國族、或是族裔，

最後只剩下不知所云的「人類認同」，國族主體與族裔身份的迷失難道不是另外殖民結果的形式。換言之，在人類事務中，對於國族概念的認同與效忠，是充滿強烈族裔情感的理念體現或覺知行動，抑或僅是集體無意識的受殖者認知，有其關注的必要，亦即中國認同在台灣人的想像中，是文化中國？疆界中國？或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在此同時對於這些景致的敘事過程，關乎「台灣」的聯想又是什麼？不同族裔的台灣視野是否存在差異？或也需要思考、比較。

自我的雙重意識具有 M. Foucault 的「雙重特質」，因而外延了 H. K. Bhabha 謂之「雙重身份」的衝突性與協商性。在知識型因世代重疊及社會變遷而生矛盾、混雜的場境中，呈現社會先於意識存在，但也受意識擠壓的現象，突顯個體既受外在力量限制的客體，亦能自我覺察的自由主體的屬性。身份建構便是這種自內與對外的差異比較結果，除了對於明確的種性特徵或族裔文化有所感知外，更是對於權力結構傾斜的認識與詮釋，甚而，從抵抗或順服的矛盾中，形塑一套動態認知，該特質的覺知歷程並非堅持某種特定身份，因此不為虛妄多元主義的多重語境侵吞，至多視為受殖者承殖民者教化與宰制，在矛盾、模擬而混雜情狀中，形成「雙重視野」(double vision)的反應。W. E. B. Du Bois 是首位以這種「雙重意識」詮釋種族隔離政策的非裔美國人，他的黑奴與荷蘭、法國移民的族裔血緣與異鄉成長的經驗，讓他在《黑裔祖靈》(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一書中，深刻體會身為「黑人」的二等公民滋味〈郭實渝等譯，2002：41-42〉。在該文的首章「論我們靈魂的對抗」(Of Our Spiritual Strivings)，Du Bois 〈1903：3〉明確指出「我們」亦彼亦此的雙面性(two-ness)——兩個靈魂(souls)和兩種思維(thoughts)、兩股抗衡力量(unreconciled strivings)和兩相衝突的理想，在一個陰暗軀殼內交互拉扯著極力抗拒分裂的靈魂。Robert Paul Wolff 認為，這是一種不得不的「人我隔閡」的世界觀，除了外顯的體徵差異外，更存在一種觀看自我，同時覺察外於他者，但卻僅以他者回應自我的意識經驗〈郭實渝等譯，2002：41-42〉。Du Bois 〈1903：1-5〉如此深刻的描述：

在我(me)與這個他者的世界中，存在一個人們難以啟口的疑問。有人出自於愛心(feelings of delicacy)沒有直接問我，有人因為道德因素考量刻意避開，不過，他們一直關注著這個問題，因為他們總是好奇地打量著我，不管是否帶著憐憫的感同身受，他們心裡想知道的是：身為一個問題人物會是怎麼樣的感覺(How does it feel to be a problem)? 雖然他們會先說：「我在我家鄉認識一位很傑出的有色人(colored man)」、「我曾在 Mechanicsville 打過仗」(研究者註：一個美國南北戰爭重要的戰場之一)、抑或「這些南方佬的惡行(outrages)是不是讓你青筋暴露？」面對這些問題，我通常報以微笑，或也覺得有趣，但亦偶有怒氣一觸即發的情境。不過，回到這個問題的根本：身為一個問題人物會是怎麼樣的感覺？一言難盡(I answer seldom a word)

畢竟，身為一個問題人物是一種不為外人道的親身經驗，尤其對我這種從無類似經驗的人而言。如果真的有的話，那或許是發生在我孩提時代及在歐洲成長的那段年輕歲月。……，那時我的學校生活尚算愉快(merry)，直到有一個新轉來的女孩拒絕和我玩交換卡片的遊戲。那個拒絕相當的直接，而且很不屑。猛然的一剎那，我覺察到我和另外一群人的不同(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儘管在心靈(heart)、生活(life)和追求(longing)似有共通之處，但從此我知道我們之間，永遠阻著一道隔閡(veil)，不過，我無意打破或攀越那道鴻溝，只是一如往常地活著，而且盡量活地更好，我努力贏得比賽或考取高分，以證明我的能力。幾年過去了，這些我長久以來的追求，似乎也慢慢褪去原先想像該有的意義，這時，我才真正明白，那種成就的樣式是他們的，從不屬於我。不過，我又覺得不甘心，總認為他們不應該擁有這些榮耀(prizes)，無論是部份或全部，我都應該要回來，至於，用怎樣的方式，包括讀法律、當醫生、說故事或其他，我還未決定。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黑人男孩都和我一樣，他們的成長過程通常處於趨炎附勢、懷恨、妒忌或批評關於白人的一切事物，有的甚至自怨自艾地過完一世。其實我不懂上帝為何將我放逐在我自己的軀體內，以一個既是陌生人又是當地人的身份，遊蕩在祂的

國度裡，要我抵抗、順從、或是帶著絕望與希望參半期盼努力的掙扎。

我們是美國有色族裔之一，但與埃及人、印度人、希臘人、羅馬人、條頓人、蒙古人，最大的不同是，我們與美國這個世界天生就存在一道鴻溝，而我們也有一種有別於他們的特殊的直覺或洞察力，不過，我們終究還是只能徘徊在真實的疆界與無形的驅逐之間，是美國人但也是黑奴(Negro)的雙重意識，我們把自己鎖在永無止盡的雙重特質(two-ness)之中，不斷自我拉扯，但也同時不斷維繫著自我的完整。美國黑人的歷史就是這種意識對抗的歷程記錄。...

初看 Du Bois 在黑與白的族裔問題、或是更明確稱為「種族問題」的思考，似乎離本研究有些遙遠並與研究主題有所落差，不過，細究該雙重意識在黑人的身份認同顯現的衝突性與協調性後，卻也在過去本省籍、客家籍以及原住民籍的台灣人，甚至是現已在台灣生活數十年並無遷居他處的部分外省族群身上，發現同樣的雙重特質與意識對抗。若以 Robert Paul Wolff 的見解觀瞻，便是一種面臨「去中心化」(de-centering)的失重狀態，「像每個人一樣與內在自我合一，但是又要外在於自我，用別人的眼光注視自己—用一種刻板印象的方式，不是用 Du Bois 所說的方式，而用一個普遍黑人的方式。如果你是黑人，拉丁裔美籍人士、或者其他亞裔美籍人士，只要閱讀此書，馬上就可以了解 Du Bois 的意思；如果你是白人，恐怕就要努力想像才能理解這種分裂的意識」〈郭實淪等譯，2002：442〉。換言之，如果你具有台灣國族認同的覺知或對於中國人身份曾感到懷疑，甚至在毫無中國經驗的成長過程中，曾經警覺到自己竟然和外省籍的台灣人抑或外省族群(不認為台灣國族但生活在台灣的群體)，產生類似的「中國想像」或是「意象」(illusions)，只要閱讀 Du Bois 的著述或本研究，馬上就能意會研究者的意思，如果你是外省族群或從無台灣國族感知，甚至執意堅持中國人身份的人，恐怕必須努力想像才能理解這種「外壓但自內抵抗分裂的意識」，或者此刻已經開始產生另外的思考。本研究便是針對此種思考及其自為中國想像的認識，從事這樣一個「台灣國族認同」的本質性論證。

第一節 亞裔人觀點的國族敘事

相對於「Where are you from?」是一個簡單的英文疑問句或問候語，「I'm from...」或「I'm...」則是一個趣味盎然的答句，有時甚至出現劍拔弩張的火爆場景，因為 from 的後面可以是「出生地」(hometown)、「居住地」(place)、「國籍所在地」(state)，也可以是「國家」，而 am 的後面只有「國家」的選擇，不過，這兩個「國家」的指涉，還包括 country、nation、nationality、state 等的差異，每個人依文化意識及國籍護照有了選擇性的詮釋與認定，也有意見相左的對立，甚而，有人懷疑這種分類的必要性或實用性？畢竟，語言只是溝通工具，聽者與說者能夠懂得彼此傳達的訊息即可，何必深論，但問題便是自此衍生，因為這是一種對於理想溝通場境的想像，亦即預設「我們所使用的語言只要彼此能聽得懂或符合文法規則，便能達到也應該會有溝通的效果」，於是對部分的台灣人而言，「I am from Taiwan」顯然已經包括「I am a Chinese」的語意，也就是「我來自台灣」可以等同於「我是中國人」的宣稱，這種忽略也忽視語法句型的表意結構原存在一種規則性謬誤的推理，而其辯證邏輯亦隱含一種意識型態衝突。

肯定句與否定句並無正確性(correct)的題旨，只有合乎文法規則與否的「對」(right)或「錯」(wrong)，若以「It's sunny」的句型為例，縱使現在外面正在下雨，我們也不能將該句型認定為「否定句」，因為該句型中沒有出現任何否定字義，在參照實際情況後，至多只能以「It's = It is」的現在式概念否定其不符合現況的部分，作出語意「不正確」(incorrect)的評斷，但不可據此認定是「否定句」或「錯誤語言」。若以本研究命題為議，「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的英譯是「Is a Taiwanese a Chinese」，原只有肯定句或否定句的回答，即「Yes, she/he is.」、「Yes, she/he is a Chinese」或「No, she/he isn't.」、「No, she/he isn't a Chinese.」，但改為「Is a Taiwanese a Taiwanese or a Chinese」時，回答卻可能出現外於題幹的排列組合，如「She/He is a Taiwanese」、「She/He is a Chinese」及「She/He is both」，

也可能是「Both not」部分否定或「Neither nor」全部否定，亦即原本的疑問句型加上了 or 選項以後，否棄了肯定與否定的必要，出現絕對肯定、兩者皆是或非、甚至充滿想像空間的答案，如「Both not」。若以此「疑問句」改寫成「直述句」，「Is a Taiwanese a Chinese」就變成理所當然的「A Taiwanese is a Chinese」。當然，這個問題原就有一個藏於文法規則及辯證邏輯的表意謬誤，因而在沒有設定回答對象的情況下，一個對於 Taiwanese 或 Chinese 毫無知悉或感知的人，面對這種以相對客觀性的第三人稱為主詞的句型，僅有無意識或無意見的回應，不會出現「Am I a Taiwan or a Chinese」的反思，不經意間，語言的「莫名其妙」揭示了國族認同被霸權抹消矛盾的軌跡。換言之，「你來自那裡？」的問候語，在直覺反應的 from 或 am 應答中，引動了地方與國家的命題，出現「肯定與否」(yes-no)的疑問句型，接續的問答變換更呈現了某種意識的無意識，尤甚是殖民者的複製形式。少有國族認同問題的國家如英、美兩國，經常「I am from America」便是「I am an American」、「I am from England」亦為「I am English」，即便回答者是黑人、印地安人、華人，那種堅定語氣有時就算引發「數典忘祖」的批評，或也在所不惜，例如前 CNN 主播宗毓華就曾明確地表明「不是中國人」的立場，而曾任 Bill Clinton 演講撰稿人的 Eric Liu 在《偶然生為亞裔人》(The Accidental Asain) 更是堅定自己是「中國優勢時代的華裔美國人。是華裔美國人，不是在美華人，不是美國華人，不是美國的華人」，而且他很堅持這種區分〈尹萍譯，1999：118〉。當然，這種區分也讓他產生了「雙重意識」的掙扎，因為他在同段末行如此說：「我身為華裔美國人，這個身分使我特別有價值，也使我特別脆弱」〈尹萍譯，1999：118〉。研究者對於 Eric Liu 的想法特別感到興趣，因為他有一種面對自己國族認同的坦率與真誠，從不也未曾想過掩飾自己是美國人的真實。進入主題前，Eric 的故事或許值得參考，對照多位台灣人的國族敘事後，亦掠美尹萍的序文：「如果是你，你會怎麼改變？你怎樣看待家人和自己的改變？」〈尹萍，1999：九〉再者，你會怎麼看待自己的台灣人身份，還是你從未想過這個國族問題？

美國人就是美國人，英國人就是英國人，他們不是我們可以從身體特徵聯想的外國人，因為縱使他們有不同的族裔身份或膚色形貌，但是他們非常堅定自己的國族認同。Eric Liu，一個可能隨國民黨退守台灣的外省人抑或早於明鄭時期渡海來台的本省人，在「父親之歌」如此表示自己的堅持〈尹萍譯，1999：6〉

劉兆華一九五五年來美國時，才十八歲，是一個中國人。三十六年後他去世時，我敢說他已不盡然是個中國人。至於他的兒子，恐怕只有華人之名而無其實。但是說到底，這些有什麼意義？華人不是華人，是怎麼判定的？依其使用的語言文字？依其行為方式？依其所知所學？華人的特質，又是怎麼代代傳承？部分的答案，我知道，藏在這本我看不懂的書裡。另一部分的答案，我猜是我必須動手寫在書裡。

Eric Liu 在整理父親的遺物中，發現一本「父親於一九九一年去世時，他的幾位童年舊交編纂而成的」書籍，「全書一百九十八頁，絕大部分是藉眾人之筆，重建一群男孩在戰後台灣的青春記憶」〈頁 4〉。或是親情的呼喚、抑或對於族裔文化的好奇，Eric 有幾次拿起漢英字典想要讀懂父親的文章，但語言的隔閡還是讓他無從捉摸。不過，從他只聽不問父母所提到的少量往事中，或也知道為什麼這個「海外華人」的身份讓他無從捉摸，甚而只是一個神話似的說法，抑或僅是一種混雜在他父親故事裡的想像，雖無意間讓他產生一股可能按著「海森堡記憶法則」(Heisenberg principles of remembrance)透過檢視記憶而改變記憶的衝動，一種「把別人的過去照自己意思打造」的一廂情願，「尤其當這個人是為人子者，感情用事地追慕他父親時」，但在集體記憶層次，他卻有另外面向的見解〈頁 8〉：

國家、種族、散居的猶太人，都是擁有集體記憶的團體，團體愈大，記憶的動機愈封閉。自認是一個「民族」的人，會把歷史的情節熔鑄成傳說，變成美的記憶，像霧似地蒸發進種族的知覺裡去。過了一段時間以後，重要的便不是共同的經驗，而是共同的記憶。

相較於 Liu 對移民者共同記憶的觀瞻，該記憶在後殖民論者看來，不盡然是

一種自發性或本質性的族裔經驗與記憶，某種程度上也會透過某種壓迫性的國族信仰構作成一個強勢的「想像共同體」，作為社群成員在國族認同的集體象徵，Frantz Fanon 覺察到的非裔法國人、Homi Bhabha 覺察到的印度裔英國人、Edward Said 覺察到的阿拉伯裔美國人、葉維廉覺察到的華裔香港人、本研究觀察的華裔台灣人等或為例證。當然 Liu 也注意到這種「雙重意識」在他身上的作用，只是他認為這個華人特質必須放在美國社會才會顯得清晰許多，因而中國在他看來，不過是「有一個國家叫中國，裡面住的是中國人；再來是世界其他的地方，多多少少也都住有中國人」，但耐人尋味的是，其中隱含「中國人會離開中國，但是中國永遠不會離開中國人」的觀點〈頁 8-9〉。準此，我們不禁想問：如果將這個意識放在台灣社會，是顯得清晰許多？還是更為模糊、混亂？這種華裔美人意識對於華裔台灣人或台裔中國人又會有怎麼樣的啓示？對照「什麼才是華人特質」的問題，該華人特質是一種離不開中國人身份的優越感？還是種族烙印抑或文化傳統的「華人作風」？或有另外深思？Liu 是這樣闡述他的想法〈頁 12-13〉：

在典型的移民故事裡，第一代總念念不忘祖國，第二代卻棄之如敝屣。作者會告訴我們，這是同化的悲劇；移民父親還想像著自己是在流亡，美國的兒子卻竭力證明自己有歸屬感。我承認這種敘事法有聳人聽聞的效果，但不幸的有捏造之疑。為了增加敘事的張力，作家們故意不提父親其實也已改變。我們把第一代的人生當成蛹，是祖國幼蟲階段與全美國化的第二代之間的過渡。其實，做父親的自己也可以變成蝴蝶。

在「父親之歌」的尾聲，Liu 更語重心長地表示〈頁 28〉：

華人特質不能幫助劉氏一家減輕失去親人，後揮之不去的痛感，也不能解釋為何雖懷此巨痛，我一想到爸爸還咯咯大笑。父親走了，他是不是華人沒有關係，他像一個不活動的容器，承載的是共同經驗的記憶。父親死了，你才會體會到：記憶如液體，身體如盛液體的杯，是記憶填充我們生命的內容，透露我們的人性。

讀完這段，Eric Liu 提醒我們，假如「僅僅說我成了香蕉，變成認同白人，

是太簡單了」〈頁 32〉。因為「在敏感的青春期的，我漸漸認同的不是一般白人，而是某一種人，他們多半是白的，受過良好教育，富有，出入漂亮場所。我學的是他們的樣，在乎的是他們的評斷。因為我認識了他們，舊思考方式像靈魂周邊堆砌的台架，紛紛垮掉。因為認識他們，我開始想像自己超越種族界線」〈頁 32〉。相對地，如果是 1861 年隨顏思齊、鄭芝龍或更早以前渡海來台的第一代中國人，有著移民故事裡念念不忘祖國的情懷，我們可以理解，但是歷經滿清皇朝、日據時代、國民黨政權的統治後，如果有人還是緊守著這種「中國人」的華人特質，尤甚是和 1948 年後隨中國國民黨退守台灣的外省人在體內裝著相同的、共同的經驗記憶或生命內容的家國想像，我們便有所遲疑。假若將近一百年處於「幼蟲階段」的歷史變遷，若無其他正當理由或不以足說服多數的台灣人，「中國認同」是一種念念不忘祖國的情懷，甚至是必須代代相承的族裔傳統，難道這不是體現「歷史事件從未使人成熟」的殖民結果，亦也說明「人性總是在規則的系統中，安置它的每一個暴力，因而從統治走向統治」的霸權壓迫？再者，Liu 對於白人的認同是一種移民者自願趨附的同化，這與當前部分台灣人對於「中國人」抑或「中華民國」的認同是截然不同，畢竟，某種程度上，這種台灣人中國化或中華民國化的歷程存在強權壓迫與殖民統治的單向教化以及族裔意識的抹消。因而，有別於「華人特質不能幫助劉氏一家減輕失去親人後，揮之不去的痛感，也難以解釋為何雖懷此巨痛，他一想到爸爸還咯咯大笑」的景致，在部分台灣人的腦海，永遠無法浮現如此歡樂的移民者記憶，因為他們曾是被壓迫的受殖者，連基本的常民活動都被剝奪的弱勢群體，而且他們的家人不盡然是病死，有的甚至怎麼死的都不知道，當時的焦慮、驚恐、怨恨、忿怒，現在的追問、質疑，難道只因為加害者或旁觀他人痛苦者為卸責說出「沒愛心」、「咬著死人骨頭不放」或是其他道德性、教條性、甚至不堪入耳的話語，便要放棄苦等數十年或已永遠無法等到平反的正義訴求，最後讓「我們要求的公平正義」再次為「多數人的利益」犧牲？

近日法國選出一位具有匈牙利及希臘血統的總統 Nicolas Sarkozy，這個混種

血裔的特質讓一些生活在台灣但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外省族群，找到自為雙重身份的混雜論述基礎，甚至是蔣介石個人家國想像的延伸，因而，楊渡〈2007：30〉這樣推理：「最近才結束的法國大選，新當選總統薩柯奇是匈牙利移民的第二代...這對於法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一個戰後出生的全新世代、移民世代，以土地和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民的共同利益為出發的世代開始掌權。而台灣，卻還要把自己逼回第二次大戰後的國共內戰年代，停滯不前，簡而言之，咬著死人骨頭不放！」。明顯地，楊忽略法國總統 Sarkozy 就職感言的重點：「我們成為法國人，不光因為我們生在法國，更因為我們選擇留在法國」，「國家認同不需要抹滅族裔的記憶，更不是要求我們忘記各自的過去、抹滅我們對故鄉的記憶。成為法國人，不需建立在每個人都拋棄自己的過去，更不是建立在抹滅個人良知上。而是建立在個人以國家認同為基礎的自我認同上。成為法國人是希望多元的參與能一加一大於一，而非小於一」〈奇摩網站，2007〉。若將 Sarkozy 文中的法國改為台灣，會有更為深刻的感受，亦即「我們成為台灣人，不光因為我們生在台灣，更因為我們選擇留在台灣」，「國家認同不需要抹滅族裔記憶，更不是要求我們忘記各自的過去、抹滅我們對故鄉的記憶。成為台灣人，不需建立在每個人都拋棄自己的過去，更不是建立在抹滅個人良知上。而是建立在個人以國家認同為基礎的自我認同上。成為台灣人是希望多元的參與能一加一大於一，而非小於一」，過程中，我們沒有任何其他需要認同或效忠的國家，縱使和其他國家有經貿往來，絕不會因此出現雙重身份的錯亂。再者，「概括性」的語境侵吞是一種典型霸權者心態，不問他人是否認同這樣的作法或說法，只要是符合霸權者的認定標準，即刻納入他們的「泛化範疇」，無一倖免地成為他的屬民，也要接受他冊封的國族意識與族裔身份，因為「一個全新世代、移民世代開始掌權」的構念，是以 1947 年後隨國民政府來台的移民者作為全新世代，在此之前的僅是舊世代，無法或不應該「掌權」？對照蔣介石的威權體制，這種自為台灣新世代的想像是多麼深刻！

Liu 在《偶然生為亞裔人》的覺知歷程是循著「父親之歌」、「講英語長大」、

「偶然生為亞裔人」、「中國城」、「黃色星球」、「新猶太人」以及「血誓」延展。「父親之歌」強調普同性、生物性及社會性的親情聯結；「講英語長大」是社會存在決定國族意識的成長探索與認同歷程，某種程度上，亦透露外於種族衝突的階級問題；「偶然生為亞裔人」讓他重新省視自己的種族體徵與族裔文化所代表的意義，並思考經此外延的國族認同問題，探尋如何賦予這些包括他自己，來自異邦但已全心歸化為美國人的族群，一個更貼近真實的國族身份；「中國城」是他對於亞裔美人身份懷疑的依據，對比猶太裔美人共同擁有的宗教與歷史傳承，以及拉丁裔美人的共通語言基礎，「亞裔美國歷史」的大標題似乎僅有認同骨架，缺乏文化內涵的血肉。走進他的外婆在中國城的生活環境，聯結華人特質的文化理解，讓他感受「中國城」的生命力，有別於亞裔美人在任何族裔特質的侵吞，這個特殊族群帶有的「奇習怪俗」卻也讓他「覺得其中蘊含意義與教訓」〈頁 88〉；「黃色星球」是 Eric 對於自己美國人身份的表明以及美國價值的捍衛，縱使他的華人血液曾因族群或種族衝突沸騰過，也曾對於中國崛起連帶經濟獲利及文化呼喚動心，但是這都無損他對於自己是美國人的身份絕對認定，當然，他更無法容許他人對於他的忠誠度與公民資格的質疑。「土生子」的表述強調「是已同化的第二代」，而漫遊中國時更覺得自己是美國人〈頁 136〉，即便在站在上海一棟殖民式大樓前面，一度像是「回到家，悠然自在」，但他明白那僅是「假裝一下自己不是美國人」〈頁 136〉，而不是因此「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尤甚是他相當明白華裔美人的身份範疇內，始終存在「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的差別」、「移民者與流放者的區別」、「同化者與被同化者之間的區別」以及「庇蔭與光榮的區別」〈頁 145-146〉；「新猶太人」是亞裔美人的新稱號，許多共通族裔特質讓美國人將這樣的範疇聯結成團，但是這種將種族特質硬是擠壓進個體或壓縮成某個團體的文化 DNA，以區分種族的方式談論種族特性的作法，讓他很不舒服〈頁 156〉。Eric Liu 自陳有一種「記憶羨慕」(memory-envy)的煩惱，對華人群體記憶的缺少，讓他感受到自己人生「是種族歷史之最新一頁的那種感覺」〈頁 157〉，繼而也從

猶太人對於族裔集體記憶的描述中，透過比較華人特質，精確的說是家族印記，找到自己該有的文化記憶，至於，數不清的過去與未來的華人淵源，不過是一條長長的黃線拉著「已死的與未出生的」兩端的華人及其後代，他不覺得這與他們有什麼相關，尤甚是他認為「我就是我。我是我們家族第一個在美國出生的人」〈頁 158〉，甚而，在重合「美國」與「國家」公眾歷史的覺知中，他的「記憶羨慕」略得抒解〈頁 160〉，更重要的是他從來不認為亞裔是一個民族。亞裔，充其量只是一個標籤，一種促成美國文化與社會變遷的歷史必然群體〈頁 179〉；「血誓」就在這樣的歷史階段產生了，迎娶一個白種女人，並非早有計畫，亦非證明什麼或突破傳統，只不過是他遇到誰，誰答理，就會有這樣的結果〈頁 182〉。彷彿一切就是那麼的自然，不管是同化、認同、許諾，甚至是語言和呼吸的空氣都讓他像是美國人，而所謂的「中國特質」不過是他家庭生活的全部記憶。即便他很願同意他像他的父母，但這只是把他的疑問往前推一代：父母的哪一部分是中國的，哪一部份是他們自己？〈頁 193〉至於，誰是華裔美人？誰是亞裔美人？這種在美國一度很明確的問題，現在僅是讓問題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難以回答。過去黑、白、亞、西班牙、美國印地安的「族裔五角」(ethnoracial pentagon)問題曾困惑美國人許久，但對照美國近年來的時局變化，也不得不承認這五角制並非一成不變，亦非無可改變〈頁 196〉，Liu 再次提醒我們：「種族，是一種虛構」的無意義的生物名詞，更重要的是，「此地所發生的事，當然不是固有的。它是未來」〈頁 210〉。對於這個未來的理解，需要我們將 Liu 敘事中的美國改為台灣，才能體會也才不致於誤解，亦即誰是華裔台灣人？誰是台裔中國人？這種在台灣一度很明確的問題，現在僅是讓問題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難以回答，縱然過去因省、客家、原住民、外省的「族裔四角」(ethnoracial rectangle)問題曾困惑台灣人許久，但是對照台灣近年來的時局變化，也不得不承認這四角制並非一成不變，亦非無可改變，族群僅是一種虛構、無意義的生物名詞，更重要的是此地所發生的事，當然不是固有的。但別忘了，前提是：我們都是台灣人，即便中國覺醒，

要施展潛力，台灣也該這麼做，而且更要堅持自己的主體意識。

「父親之歌」的親情呼喚引動了 Liu 原鄉情愫的思考，「講著英語長大」的環境，卻讓他深刻體會到身為華裔亦是亞裔的特殊境遇與差異覺知，雖然「相當程度地由邊緣趨近美國生活的中心」，但也同時讓他瞭解所謂的「同化」，不過是「有的人生為白人，有的人學著變成白人，還有的成為白人而不自知」〈頁 35〉，更重要的是他並不以這種心態為榮〈頁 51〉，他相信自己已超越亞裔迷思牢籠，認為「典型的亞裔人」與「非典型的亞裔人」其實相差無幾，畢竟「兩者皆不是人類自由意願的產物」，之所以「現在把它說出來，不是要為之辯解，反而是要消毒，不要讓它繼續擴散」〈頁，51〉，亦即該特殊身份讓 Liu 有一種想要「破除刻板的印象，結果卻像扛上了這個枷鎖」的覺知〈頁 51〉，回首那些「少年時的想法與做法。現在看出自己走的直路並不是唯一，甚至也不是最好的路。這條路也許能超越種族，卻不一定有必要嘗試」，而「如果早些認清，種族認同並不是『不接受便消除』，可以省掉很多頭痛」〈頁 52〉。或許，這個敘事文本讓有些人產生是「離不開中國」的錯覺，但「在思索自己的心理歷程、家人的一生經歷後」，Liu 這樣提醒我們〈頁 54〉：

我在這裡，立足於一個新的國家。我不是放逐者，不是居留的異邦人，而是國民。我放眼細看我所進入的特權區，了解幾件事，是我父母輩以前初來到他們的新國家時，可能也感受到。我了解到，我的進入給了我很大機會。我也了解到，我為進入付出了若干代價。我忽視了祖先的遺產，失去了一些東西。對，我能說一點中國話，會炒幾個簡單中國菜，我去過中國，知道一些中國歷史。但我還是不能以道地的華人自居。

不過我也不願承認「內在白」。我不想成為白人，只是想融合。我認同掌握經濟與政治權力的白人，不是因為他們的白，而是因為他們的權力；我想像自己混雜在影響我們文化潮流的白人中間時，為的不是他們白，而是他們的影響力；我倣效從容應對世事的白人，不是因為他們白，而是因為他們的從容。

暫且不論 Liu 這個表述是否隱含一種或多種同化形式的問題，包括熔爐式、教化式、結構多元主義、以及可能引發衝突論與功能論的爭議，抑或者是帝國及殖民主義引動的種族優越、啓蒙智識或文明建制的趨附，我們還是可以深刻感受他對於身為美國人的強調國族認同與覺知，甚至是一種國族情感與信仰。當然，我們也在這個敘事文本，發現 Liu 本身對於華人特質及白人價值的評斷以及結合二者形成的「華裔美人」具有怎樣的特殊族性與國族意識，有其獨到的見解。

Liu 是這樣詮釋自己的「白色特質」〈頁 57〉：

我學習的對象差不多總是白人，我並不喜歡如此，因為這說明機會分配仍然不均。但若只因為我向他們學習，便說我是個白人，於事無補。今天機會最差的美國人都是有色人種，這事實已夠殘酷，若再用自己的語言把這事實變成鐵律，豈不更殘酷？我們不該再把同化說成「照白人的方式了」。

也不該再把同化看成失落，應該認識到，所喪失的不見得有那麼神聖。如我所說，我的華人成分已不很多，我也常決心多保留一些傳承，但我的忽略、我的許多遺漏，真的完全錯誤？G. K. Chesterton 曾寫道：「保守主義的基本理念是，如果你不管，事情就不會變。其實不然。放任一件事不管，就是任它受各種激流的沖刷。」我也許生而為一個華人小孩，但如果要維持為華人，必須父母與我要不斷地增強我的華人特質。但我被放任不管了，結果我受到各種各樣的激流沖刷。

初看這個段落，或僅得知 Liu 對於同化不等於白化的澄清，但如果我們將該段落文字略為修改，如白人(色)改為台灣人、美國改為台灣、有色人種改為外來族群、同化改為本土化、華人改為中國人，或許會發現這與當前台灣部份的外省族群，尤其是經濟、語言或其他社會條件相對弱勢的群體，在面對本土化挑戰時必然承受雙重意識拉鋸的現象有所聯通，而在研究者的研究過程中，亦也證實了這個共通性，不過，同樣地，研究者卻也在部分的本省籍、客家籍、原住民籍的台灣人身上，尤其是經濟、語言或其他社會條件相對優勢的群體，讀到另外層面差異，亦即將白人(色)改為中國人、美國改為台灣、有色人種改為台灣人、同化

改為中國化、華人改為中國人，竟然發現這些台灣人和反對本土化的外省族群及其抱持著的「中國認同」產生高度聯結性，尤甚以「所謂大時代格局」的詮釋，強迫過去的「中國人」以及現在的「台灣人」接受「共匪」的統戰理念，這或也間接支持了 Liu 在同文末段的覺察〈頁 55-57〉：

必須記得，這樣做是破壞也是創造。激流中會有新東西出現。這個東西未經開發，像是說著一個未成形國家的未成形語言。這個東西不是白的，很可能比我以為的更中國。不管我將變成怎樣的人，合成物難道一定比較正宗？這樣的我，難道比別個樣子更無價值？每一個同化的例子中都有對歷史的反叛，但其中也有一種命運，就是重新定義歷史。做為現代的美國人，在精神上、血液裡，其意義都比以前任何世代更混雜得多。因此，與移民的痛苦與機會同時存在的，是以下事實；美國不再是白色，而且永遠不會再是白色。

準此，Eric Liu 引用美國黑人作家，James Baldwin 在瑞士一處從無黑人去過的村莊住過一陣子後的感言：「這個世界不再是白色，而且永遠不會再是白色」〈頁 53〉揭露「美國各種族命運與認知如此糾結不清」的現實〈頁 54〉，不過，一如 Baldwin 的理解：「美國人不可能重歸這歐洲山村似的單純。在這裡，白人還能把我當成外鄉人看待」，所以他也的確明白「我其實，在任何美國人眼中，都已不再是外鄉人」〈頁 54〉。而在這個段落，他總不忘記提醒讀者，美國對於他或其他族裔的國族意義，縱使「做為現代美國人，在精神上、血液裡，其意義都比以前任何世代更混雜得多」〈頁 56〉，美國終究不再是白色，而且永遠不會再是白色。準此，沿著前文改寫的文字脈絡，重新閱讀並對照以下兩種「事實」：

必須記得，這樣做是破壞也是創造。激流中會有新東西出現。這個東西未經開發，像是說著一個未成形國家的未成形語言。這個東西不是台灣的，很可能比我以為的更台灣。不管我將變成怎樣的人，合成物難道一定比較正宗？這樣的我，難道比別個樣子更無價值？每個本土化的例子中都有對歷史的反叛，但其中也有一種命運，就是重新定義歷史。做為現代的台灣人，在精神上、血液裡，其意義

都比以前任何世代更混雜得多。因此，與移民的痛苦與機會同時存在的，是以下事實；台灣不再是台灣的，而且永遠不會再是台灣。

也可以這樣改寫：

必須記得，這樣做是破壞也是創造。激流中會有新東西出現。這個東西未經開發，像是說著一個未成形國家的未成形語言。這個東西不是中國，很可能比我以為的更中國。不管我將變成怎樣的人，合成物難道一定比較正宗？這樣的我，難道比別個樣子更無價值？每個中國化的例子中都有對歷史的反叛，但其中也有一種命運，就是重新定義歷史。做為現代的中國人，在精神上、血液裡，其意義都比以前任何世代更混雜得多。因此，與移民的痛苦與機會同時存在的，是以下事實；台灣不再是中國，而且永遠不會再是中國。

認同並逐漸接受本土化事實的外省族群在台灣國族認同層面或無構念斷裂的問題，但對於本土化或台灣國族認同有所遲疑或反對的族群身上，卻可覺察到外於 Eric Liu 華人特質與國族認同的差異旨趣，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不願意妥協但又自為結構內外的中國想像與發明。換言之，Eric 不承認他的華人身份，即便他不反對也無法反對他具有的華人特質及中國人種族體徵的事實，但也絕對堅持美國人的國族認同，如果真要聯結華人的集體經驗與記憶，至多僅在家族的情感範疇，勉強稱作「華裔美人」，而且堅持「不是在美華人，不是美國華人，不是美國的華人」的這種區分。準此，接受並已開始學習適應本土化的外省籍台灣人，雖明白「機會分配仍然不均。但若只因為我們向他們學習，便說我們是個台灣人，於事無補。今天機會最差的台灣人都是外來族群，這事實已夠殘酷，若再用自己的語言把這事實變成鐵律，豈不更殘酷？我們不該再把本土化說成『照台灣人的方式了』」。因而，他們對於台灣的未來產生樂觀的預期，畢竟「做為現代台灣人，在精神上、血液裡，其意義都比以前任何世代更混雜得多。因此，與移民的痛苦與機會同時存在的，是以下事實；台灣不再是中國的，而且永遠不會再是中國」。反觀對於本土化或台灣國族認同有所遲疑或持反對意見的族群而言，縱使「機會

分配仍然不均。但若只因為我們向他們學習，便說我們是個中國人，於事無補。今天機會最差的中國人都是台灣人，這事實已夠殘酷，若再用自己語言把這事實變成鐵律，豈不更殘酷？我們不該再把中國化說成『照中國人的方式了』。因而，他們對於台灣的未來抱持悲觀的預期：「做為現代台灣人，在精神上、血液裡，其意義都比以前任何世代更混雜得多」。這種想法我們可以理解，因為不同國族想像本就存在不同的國族覺知與願景，不過，沿著上個段落的文字改寫，「每個中國化的例子中都有對於歷史的反叛，但其中也有一種命運，就是重新定義歷史」的命題，最後竟然也和接受本土化的族群有了聯結，出現令人匪夷所思的結語：「台灣不再是中國的，而且永遠不會再是中國」。

準此，不禁讓我們對於這些「反叛例子」的敘事構念感到興趣，繼而想追問這些具有差異程度甚至毫無中國經驗的群體，如何在國族認同範疇，發揮相似的雙重意識對抗與拉攏效應。換言之，到底他們是怎樣看待自己是台灣人或中國人的身份，更確切的說，是怎樣詮釋自己的「中國認同」抑或「台灣國族認同」。請注意，是台灣國族認同，而不是台灣認同，因為中國在國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範疇通常直接聯通國家的指涉(reference of the state)，而台灣卻有指向中國這個國家(country)的部分，或是一個獨立主權(state)的爭議。因此，台灣國族(Taiwanese Nation)遠比台灣(Taiwan)在國族認同的範疇的意義清晰，而「台灣國族認同」(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命題中的 identity，誠如研究者在「台灣國族認同的範疇」一章的界定，或也對照成 identification 的行動歷程意旨。據此，研究旨趣不在探索或尋求「台灣人是什麼？」(What is Taiwanese)，而是在「什麼原因讓台灣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What makes a Taiwanese a Chinese)。對照 Eric Liu 在《偶然生為亞裔人》中的「偶然」(accidental)，雖隱含一種命定、無法避免的語氣，但我們或也從他面對自己是華裔亦具有華人特質的事實以及坦然聲明自己是美國人的正向、積極態度中，發現我們身為台灣人該有的台灣主體認識，即便中國覺醒，要施展潛力，台灣更應該這麼做，此地所發生的事，就是未來。

第二節 外省人觀點的國族敘事

如果 Eric Liu 的父親在 1861 隨顏思齊、鄭芝龍來台開墾，他現在便是一位本省籍台灣人；如果 Eric Liu 的父親在 1955 年沒有移民到美國，他現在便成爲一位外省籍台灣人。然而不管他是本省籍或外省籍，比較重要的是：他認不認同自己的台灣人身份？精確的說，以他現在的「美國認同」爲前提，如果因緣際會他沒有成爲美國華裔的移民第二代，反而變成外省籍的台灣人，他現在是否和他認同美國一樣，強烈地表達自己的台灣國族認同？當然，這些都只是一種想像，甚至空想，畢竟，他們去了美國，成爲了美國人，而他堅持著自己是美國人事實，即便具有華裔特質，無論那是生物性的種族體徵或社會性的族裔傳統，始終改變不了他在「華裔」後，那個坦然、正向、積極的美國認同。準此，我們或也對於這種「時空錯亂」的國族身份變換產生興趣，好奇現時在台灣的這些隨國民政府或國民黨政權退守的大陸移民，無論是自願的或非自願的這群人，經過這些年的台灣生活以及和台灣人的文化互動，產生了怎樣的台灣經驗或台灣認同，甚至是怎樣程度的台灣國族認同？這些常民經驗讓他們和本省籍、客家籍、原住民籍的台灣人在國族意識呈現怎樣的異同？其中，對於自己是中國人、台灣人、或華裔台灣人的認知，是否存在「雙重意識」或「雙重身份」的詮釋？是衝突性的抉擇？還是協調性的融合？甚至是「亦此亦彼」的自爲想像或「非此非彼」的構念斷裂？

換言之，到底外省人是怎樣的一個族裔？應否視爲外於台灣國族的一個國族團體？一如美國亞裔，是一種族裔的混合體？還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性集合名詞？他們是否分享著從何而來的相同原鄉情感？或者是和亞裔美國人同樣存在外於族裔差異的階級問題？而他們具有怎樣的中國想像以及台灣經驗，讓他們在國族認同的層面和部分毫無中國經驗的台灣人有了深刻聯結？本節在討論隨國民黨政權來台的外省籍第二代或第三代，對「中國認同」及「台灣國族」的認知差異，作爲比較本省籍、客家籍與原住民籍受訪者在相同問題思考的根據。

「外省人」這個名詞早於國民政府遷台前，已在中國民間流傳，只是當時的用法在稱呼「外地人」〈高格孚，2004：29〉，例如相對於廣東省，來自福建省的外地人便是外省人。同理，相對於光復後的台灣省，來自大陸其他地方的外地人，自然稱為「外省人」，而久住於台灣或已在台灣落地生根包括早期來台的福建人、廣東人、漳州人、潮州人等居民則自稱為「本省人」，但這個本省人以漢人為止，不包括台灣原住民，尤其是曾僅強調「居住於台南一帶或是台灣府所在區域漢人的狹義解釋」〈陳芳明，1988：43〉。1945年台灣因抗戰勝利重回中國一省行列，姑且不論這個歷史事件背後指稱的「歸屬問題」，許多從中國大陸移往台灣的人，在當時普遍被稱為「大陸人」，是一種相對於「台灣人/本省人」的稱呼，不過，該大陸人僅限於台灣民間的說法，不可與當時帶有官方色彩的「外省人」聯通，而這些「外省人」亦不會以此自稱，他們通常會依據本身的籍貫表述為江蘇人或廣東人〈高格孚，2004：29〉。這個外省人的稱呼直到陳儀奉令在台灣成立政府機構後才全面取代大陸人，成為來自島外大陸遷徙者的稱謂，尤其是變成本省人心中充滿負面形象的別名。按高格孚〈2004：30-34〉的考察，1945年後外省人與台灣省民的衝突日益增多，相對於早期的「大陸人」，由於國民黨政權的貪腐與威權引發許多省籍對立的流血事件，包括二二八屠殺、白色恐怖、清鄉肅清、頒布戒嚴令、以及諸多不合理的動員堪亂時期臨時條款，「外省人」在台灣人民的心理屆時已然變成壓抑他們的政權、軍隊、警察，甚至是一種無謂的反共政治思想、以及要他們對抗一個從無瓜葛的共產黨政權的三民主義、連帶是逼迫他們對於從無接觸的中國有所認同並產生情感，其中，對應於外省人這個族裔異者(the other)，「本省人」更透露了一種低劣文化、皇民倭寇的歧視意味。自此，加深了台灣人和外省人之間「相異外在性」的鴻溝〈高格孚，2004：30〉，即兩者相互認為彼此在文化與習慣上存在必然性差異，由外省人看來，本省人是低俗土人，相對地，本省人卻認為外省人是鴨霸的土匪，尤其是戰敗的軍人和蠻橫的難民。

當然，事實不盡然是如此。我們知道這些渡海來台的大陸人並非全是軍人或

難民，再者他們來自大江南北，我們不應該簡單的用大陸人或外省人的語境侵吞他們所擁有的族裔身份與文化傳統，更重要的是，不能將他們全部等同於蔣介石政權的同路人，因為他們有的是早於中國共產黨內戰獲勝前便已舉家遷台，一如以環保問題聞名的馬以工教授及其家族，而有的是被迫從軍的大陸青年，有的是被騙來台為蔣介石賣命的農民，這些無辜的外省人多數在台灣一待就是數十年，老家遠了，家人死了，更可憐的是，天真以為過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家的那些人，不敢結婚，怕耽誤別人，卻讓蔣介石耽誤的善良榮民。受訪者當中 M6 高先生，說了這樣一段感言：

我爸爸這輩子的遺憾，就是沒法兒看見自己家鄉的娘親，還有見了幾次面的相親姑娘，不知道人家有沒有在家鄉盼著他回去娶親。

我爸爸比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早死了兩年，所以蔣經國的德政他沒見著兒，倒是死的時候，有警告我，千萬別被國民黨騙了，蔣介石、蔣經國，他們姓蔣的一家，沒個好人，只會明著笑、暗著騙、暗著殺，管你是外省、本省。

到今年為止，我陸續回過浙江老家幾次，其實，我一點也沒感覺，只是幫著我爸爸回去看看。幫他盡點孝道。

我爸爸死的時候沒有交待要葬回湖北老家，我想因為他來了台灣也幾十年，住慣了，也在這娶妻生子。(沉默了幾秒)。對於台灣的感情，我想就像他朋友圈流傳的一句話：久住他鄉是故鄉吧！

在 M6 高先生的話裡，我們看到另外層面的外省人形象，他對於「祖國」或「家鄉」和部份台灣人的感受並無差異，只是「父親」的老家，並不盡然是他的，台灣是他的「家鄉」，湖北老家頂多只是他孩提時代從父親口裡想像的「故鄉」。許是因為父親沒有堅持或對於蔣氏家族的忿然，許是在台灣生活了數十年，妻兒都在這裡，他父親並沒有要求他落葉歸根，因而，讓他對台灣產生了有別於其他外省人的認同感，在深思之後，亦也有了「久住他鄉是故鄉吧！」的結語。

反觀 M5 胡先生同樣對於訪談問題的回答，在「中國」與「台灣」的聯想，

與 M6 高先生有著截然不同的思考，他認為：

你也是外省人吧！（研究者沒有答腔，僅是微笑）。你應該和我一樣想到台灣就想到陳水扁的貪腐吧。你想想看，以前兩蔣的時代，台灣的發展是多麼的好，社會是多麼安定。外省人真不知道是哪裡犯了陳水扁和民進黨的沖，老是要我們滾回大陸。大陸是哪裡不好了，是哪裡得罪了民進黨，陳水扁也不想看，現在全世界的經濟還不是靠大陸，台灣不和大陸做生意，那不是找死。

其實，我也知道以前的國民黨是殺了一些人，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那個時候該到台灣，誰不怕中共在台灣早已派了些什麼人來了，要殺我們。我們當然怕，所以殺了一些人，也是不得已的，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著想嘛。不過，反過來想，現在我們不是也過的不錯，台灣人、外省人、中國人沒差嘛！

（研究者反問他，先前不是才覺得台灣沒兩蔣時代安定和有發展）

對，是沒錯，不過，我的意思是我們現在的安定是從過去兩蔣時代留下來的基礎所造成的。我奶奶告訴我，以前蔣宋美齡還在台灣的時候，辦過幾所學校和育幼院，其實，算起來也對台灣人還不錯，至少讓他們有讀書的機會，也讓一些無父無母的孤兒或殘障的小孩有地方住、有飯吃。

M5 胡先生是外省第三代，他的爺爺在蔣介石時代任職於中央銀行內某部門經理。他的爸爸是公費留學的會計碩士，目前任教於某國立大學，擔任教授一職。至於胡先生本人，現在大陸及台灣兩地跑，主要經營機器收購與轉賣事業。曾經任職於某家銀行，但興趣不合，加上不想參加職照考試，後來在家人的支持下，出外創業。除此之外，胡先生的爺爺現已退休並定居於加拿大，和二伯父及幾位姑姑同住。聽他說，他的親戚幾乎都在美國或加拿大，連他的媽媽、妹妹、弟弟現在都在今年農曆過年前移民到美國。他和父親之所以沒有離開的原因，他沒有說的很清楚，不過，倒是透露有些家族事業還在台灣，必須有人留下來處理，而處理完畢後，他們將舉家搬離台灣，至於，他自己則是因為私人問題留在台灣。涉及隱私，不贅述。

憑以這樣的段落介紹胡先生，有兩個原因：其一，他是外省人不認同台灣的典型，而對於台灣始終存在土俗的認定，甚至影響他交友的範圍，他私下曾表示：他最受不了台客和台妹，尤其無法忍受「台灣國語」，覺得和這樣的人走在一起很丟臉。其二，他的外省人身份透露的不僅是外省族裔文化的差異，更潛在一種階級區隔，亦即就算他是難民的第三代，也具有另外一種貴族的身份，和一般的外省人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環境與經驗。這種特殊經歷讓胡先生對於中國和台灣的聯想，竟然與部分具有相對優勢社會條件的本省籍、客家籍以及少數原住民籍的台灣人產生幾乎完全疊合的共通性，該現象在其他的受訪者如 M12 林先生、M14 許先生、M18 黃先生、M19 蘇先生、F2 田小姐、F10 黃小姐、F15 陳小姐以及 F18 謝小姐在「中國」與「台灣」的範疇聯想中得到確切的印證，換言之，中國經驗是透過階級，還是其他怎樣的元素，讓這兩個族裔在中國認同有了聯結的問題，或許值得思考，此外，具有相同族裔身份如 M5 胡先生與 M6 高先生，竟然出現有差別的中國及台灣認知，或也印證高格孚〈2004：31〉對於「台灣人會把外省人與壓抑台灣社會的新秩序畫上等號」的其一解釋：

在蔣介石政權統治下的台灣人，根本無法只憑著外省人外觀來分辨誰是蔣氏政治思想支持者，而誰又是與當權者政治想法南轅北轍，對其施政方式難以苟同的外省人。

至於，重合外省人與本省人省籍衝突的「歷史共業」論題，誠如前文「時代精神」與「時代錯誤」的論述，幾乎所有外省籍，甚至是多數本省籍的受訪者，都有一致的想法，亦即「那是一種不得不的歷史悲劇，我們應該就此停止仇恨，才可能解決當前台灣族群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發展台灣未來的經濟走向」，這是 F8 鄧小姐的呼籲，而 M7 黃先生亦這樣認為：

我知道這些事對某些台灣人來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是，時間都過這麼久了，也應該要放下仇恨了，不然能怎麼辦。難道要國民黨的人切腹？那些人才甘願？國家在這樣亂下去，早晚完蛋！

M8 劉先生有以下的想法：

那個時候，如果蔣介石不這麼做，他能怎麼做？難道要等本省人起來造反，把整個國家搞垮後，再來收拾殘局？人要往前看，不能老是記著仇恨。

M9 謝先生強調：

台灣太小了。如果我們整天都只是繞著這些歷史的仇恨，台灣是不會有進步的，經濟也不會有發展，還有為什麼吵這些話題，還不是民進黨要騙選票。過去國民黨是不對，但也不這樣一直吵下去，民進黨應該先檢討自己一下，怎樣搞好台灣才是最重要的，畢竟，人都死了這麼久，我們這一代也沒有什麼印象，實在不知道吵那些什麼二二八、白色恐怖幹麻！

不過，F6 的賈小姐有另外層面的省思：

我們都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應該彼此包容彼此。不管誰犯了錯或是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是應該真心懺悔，也應該誠心認錯。我知道國民黨很壞，但是他們這些年已經有在改變。我也知道，他們在這方面做得不多，但要給他們機會和時間，我相信，他們會有更好的處理。

訪談的過程中，F4 李小姐與 F8 鄧小姐是一同出席的，但她們兩人在二二八事件的看法截然不同，因為 F4 李小姐的爺爺、大伯父、大伯公及孀母，陸續在該事件(她的強調)後來的白色恐怖中被補入獄或處死、自殺。她很勇敢地表示：

我們家過去對於任何關於政府的事情是不討論的。其實，我也沒問過原因，是後來慢慢長大後，有一次，我要寫公民報告，我問我哥哥，他知不知道憲法的內容，我爸爸聽到了，突然大聲問我，知道憲法要做什麼，我說要寫報告，他還要我不要寫太多，就照著書抄就好了。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才發現，我家裡的人是不看新聞或報紙的，甚至到現在，我們家都沒有第四台。

我小時候，我奶奶總要我們家的小孩，不管是大的或小的，不要到同學去玩，我問過原因，但家裡沒有人告訴過我什麼原因，就是要我，反正放學回家，就是哪裡都不準去。原本我以為是我奶奶不喜歡我們到處亂跑，才那樣規定，但直到

我上台北讀書前，我媽媽才告訴我，爺爺和大伯公有一天帶著爸爸的大哥，去了朋友家，從此就沒有回來過，而且之後還有許多人來過家裡問事情，奶奶怕我們會有什麼事發生，才要我們下了課不要亂跑。你知道嗎？我的大伯父那個時候，才4歲，而且，後來我大伯公的太太受不了打擊也自殺了，因為他先生被判死刑，而且在知道消息的前幾天，就已經槍決了。

不過，我對於那些事的感覺，沒有我爸爸和我奶奶那一代，那麼深刻，他們對於國民黨的恨，我很能理解，但是我沒辦法真的明白，或許是年紀還小，不過，我還是覺得，過去就算了，我們要努力的是現在。不過我是不會把票投給國民黨，但要我投給民進黨也不容易，因為兩個政黨都爛，沒有比爛的問題，因為實在都很爛。(研究者問：那妳家裡的人會把票投給民進黨嗎?)

不會，因為他們從來沒投過票，而且我告訴你，我爸爸和我媽媽兩個都還是學校老師，但他們兩個從來不在我們面前談論任何學校的事，而且我和我哥哥，還讀離我們家大概要坐1個小時公車以外的小學。很有趣吧。

F4 李小姐與 F8 鄧小姐兩個人從大學時代到現在都是好朋友，兩人之間無話不談，但對於台灣本土化的問題卻通常略過，因為 F8 鄧小姐強烈反對本土化，認為這是一種去中國化的自我矮化，但 F4 李小姐的態度比較平緩，她認為縱使聯結家族的記憶，無論是苦或樂，自己中國人的身份是斷不了的，不過，台灣的本土化也是一種歷史必然結果，因為這也和部分本省人族裔身份斷不了。因此，F4 李小姐期待有兩全其美的解決辦法。如果台灣真的獨立了，她也會選擇支持。準此，或可理解高格孚〈2004：33〉為何在他的研究中寫下這段話：

如果歷史有個公斷，有的外省人必須為這樣結局負責，有的外省人則是這場悲劇裡令人同情的受害者。直到現在，仍有台灣人認為自己是外省人的受害者，但平心而論，外省人整個族群不也是歷史與二十世紀中國內戰的受害者？

必須事先聲明，研究者並不認同高格孚，這位可敬的法國人，對於「外省人整個族群不也是歷史與二十世紀中國內戰的受害者」的觀點，因為本研究對此，

另有不同面向發現與詮釋，留待後續討論。高格孚先生在原文本脈絡對於「有的外省人必須為這樣結局負責」的解釋，是指部分外省人的負面行為引發了台灣人「把外省人視為一個『單一文化』的族群」〈頁 33〉，因而台灣人透過這樣一個「歷史幻象」將所有的歷史傷害轉嫁給所有外省人，甚而，高格孚先生站在同情的角度，認為「他們從『異鄉』轉變為『家鄉』的經驗非常複雜」，但也忽略了，相對於那種轉變，台灣人在同一時間點，面臨了逆向的斷裂，或者是一種人為的雙重意識拉扯。蔣介石透過殖民教化政策與威權統治將台灣人的「家鄉」逆轉成「異鄉」的壓迫，並讓他們從此和自己父母的歷史、族裔文化的傳統、以及台灣國族的認同隔離。或許，有人會說這與「所有外省人」有什麼干係？如果該邏輯成立，我們亦可如此回應：「外省人整個族群是不是歷史與二十世紀中國內戰的受害者」與我們追問蔣介石的霸權壓迫有何干係？尤甚是我們發現並非「所有的」外省人都是歷史與二十世紀中國內戰的受害者，他們部分來了台灣以後，輾轉也去了其他的國家過著尚算安適的生活，如 Eric Liu 一家、蔣宋美齡及孔姓、宋姓親屬，其他依附蔣氏政權謀取生活而目前仍於台灣或早已移民他鄉的前朝遺老，甚至部分受台灣人稅金供養，但已移居中國大陸，並總是批評台灣不好，本土化是土俗的自我矮化的外省族群等，他們是絕對不適用「受害者」的身份。

外省人的範疇概念在討論在台灣的外省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台灣經驗與中國想像，以及如何詮釋中國崛起、台灣政黨輪替與本土化發展。研究者將透過這樣的認識，從事外省人的中國認同以及台灣國族認同的敘事訪談、分解、比較以及概念化「我是中國人」的範疇。初步發現，通常外省人在中國認同的範疇，比較不會產生 Michael Foucault 重複衝動中，對於某種記憶受到約縮、限制的軌跡，也較少有受殖者在雙重身份的衝突性與協調性，但面對本土化問題，部分受訪者會「雙重意識」的游移，某種程度上，類似受壓迫者的心理反應，因此對於中國崛起的想像，在同樣缺乏深刻中國經驗的前提下，仍較之台灣國族認同者樂觀，尤甚是抱持著強烈「祖國崇拜」的期待，批判「異鄉台灣」的落伍與自甘墮落。

第三節 台灣人觀點的國族敘事

如果外省人不是 1947 年前後隨國民政府自中國退守台灣，而是早些年渡海來台或去了其他國家，甚至早於原住民時代就移居台灣，現在的外省人，可能是美國人，也可能是本省人、原住民，更有其他多種「偶然」(accidental)的可能。當然，這些可能現在看起來都是不可能，因為他們來了台灣，成為外省人，甚至有的現在再次回復為「大陸人」。同理，台灣人如果不是 1861 年前後隨顏思齊、鄭芝龍等來到台灣，而是後來隨著中國內戰爆發逃難到台灣，現在的台灣人，或精確的說，本省人或客家人，可能成為外省人。相同的推理，或也適用於原住民。當然，這種推理限於特定意識內容推導到其他意識內容的心理活動範圍，易產生約縮性、跳躍性、連續性、必然性及不證自明的問題。不過，研究者經由該推理情境，目的在推論國族認同的必要性，亦即人類存在一種自由遷徙與環境適應的生物能力，如果以現在回推過去，通常推理結果僅是無分別、差異的普同性生物價值。某種程度上，雖然研究者肯定這個推論：人類具有普遍的環境適應能力與學習能力，或是其他共通性的特質，例如天賦德性，但並不贊成以這樣結論反向侵吞「現在」成為無需差異或選擇性詮釋的論證。換言之，研究者贊同台灣無需區分族群，但前提是台灣人必須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事實以及台灣國族的真實，亦即同意無論是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原住民，甚至是外籍配偶的婚生子女，生為台灣人絕對是一種偶然，亦是一種命定式的安排，更是一個無法選擇或可以改變的事實，不過，卻也認為「成為台灣人」是不得不的國族認同必然，是權利，更是義務，否則為什麼我們生在這裡、長在這裡，最後選擇一直留在這裡？

中國人就是中國人，台灣人就是台灣人，我們不是他們可以從身體特徵聯想的「中國人」，縱使我們有相同的族裔身份或膚色形貌，但是我們必須堅定自己的台灣國族認同，一如為華裔第二代的 Eric Liu 所強調的美國認同。不過，相較他的堅持，身為幾代之後的台灣人卻缺乏台灣國族認同的現象著實令人費解。

台灣人是指具有台灣族裔身份，包括外省籍、本省籍、客家籍、原住民籍，甚至是通婚或依親來台定居的新移民，並且認同台灣是一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族團體，因此，該國族團體是以「台灣整體」(Taiwanese Nation)為基礎，不以肢解的族群單位為特定主體，而其所對應的標的是世界諸國的國家主權，當然亦包括代表中國(Chinese Nation 或 China)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乎國族認同的重點更以整體台灣人的國族認同概念為核心，不以單一國族或認同的問題作為討論，抑或外延的文化及文化認同議題思考，更重要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代表中國政體的既定事實前提，強調台灣國族具有的國家客觀事實與獨立主權屬性。

來自台中的客家籍 M13 的鐘先生認為：

我從來就不覺得我是中國人，就算有也是因為國民黨教的。你難道沒有這種感覺嗎？我在台灣出生，在台灣長大，我沒有親人在大陸，我沒事幹嘛說我自己是中國人，那不是投共、附匪嗎？以前是要抓去關的，或者是槍斃的，你沒聽過漢賊不兩立、保密防諜的話嗎？你現在問的問題，在以前，會被判死刑的。

還有雖然我是客家人，不過這和我是不是台灣人無關。還有我很討厭民進黨的一些人，也不喜歡陳水扁，對啦，我以前很喜歡他，但現在實在是……不知道該怎麼講，反正我就是台灣人，不管我是支持民進黨，還是討厭國民黨，我就是台灣人，最多是客家籍的台灣人。

M13 鐘先生是研究者大學時代的同學，彼此曾經因為中國人和台灣人的問題起過爭執。當時研究者認為中國人與台灣人並無差異，鐘先生則非常堅持台灣人就是台灣人，中國人就是中國人的立場，而客家人身份並不影響他的國族認同。因此，鐘先生在訪談的過程中，不斷的追問研究者的轉變，這個問題也讓研究者在從事資料搜集的過程有所深思。此外，鐘先生在「中國」及「台灣」的聯想，令人感到趣味的是，他想到「中國」或「中國大陸」時，竟然想到學校的外省籍老師，而「中華文化」的想像，也有別於多數的受訪者，他的聯想是「國民黨的標語」，他這樣闡述自己的想法：

我們過去在學校，外省籍的老師，有的還真的很老，就是老到拿粉筆，都在發抖的那種，而且他們很少上正課，不是在課堂上告訴我們他以前在大陸作戰的豐功偉業，就是用很奇怪的外省鄉音罵人，有時候真的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以前真的很討厭他們，覺得這些沒事跑到台灣來不知道要幹嘛！不過，後來慢慢大了，覺得他們有的真的還滿可憐的，年青時候被國民黨騙去打仗，打完了，又被騙到台灣，而且一騙就騙了好幾十年，而且他們有的好像從來都沒回去過，因為他們在大陸的親人好像都死了，還是失散了，我也不是很清楚。現在我想了一下，還真覺得他們很可憐。

中華文化讓我想到國民黨的標語，印象最深的是，每年國慶閱兵的呼口號，還有每年都要舉辦的國語文競賽，我小時候最討厭參加這種比賽，都是我媽媽和學校老師強迫的，因為我的同學很多都是原住民，國語都說得很好笑，所以，我每年都要參加，而且幾乎每年的題目都要消滅共匪，好像他們永遠死不了。不過，這是真的，因為蔣經國死了以後，我還繼續「打了幾年的共匪」，所以他們真的比較厲害。我以前真的這樣想，你看，現在共匪果然比較厲害，把國民黨的中華民國給滅了。你上網查查看，中華民國要不是在台灣的網頁，幾乎連影子都沒有，ROC 更有趣，除了聯合國的聲明稿，就是要中華民國滾蛋的那幾篇，而且，還有剛果共和國。我如果說我是中國人，我變成共匪，我如果說我是 ROC 的人，我就變成非洲人，可能者是猩猩，或者是黑人。所以，我當然是台灣人。

這個認同敘事顯示兩層意義，其一，台灣人對於外省人的瞭解透過社會融合有逐漸改觀的趨勢，幾乎是全部的受訪者，無論傾向中國認同或台灣國族認同，只要論及省籍問題與國族認同的關係，通常對於外省人處境感到同情，亦即可以理解他們的中國認同以及對於台灣本土化運動的遲疑，不過，還是有不少受訪者包括 M11 彭先生、M13 鐘先生、M17 陳先生、F9 林小姐、F12 鐘小姐、以及 F13 王小姐等，認為外省人應該對於台灣人與中國人的身份有所取捨，因為這是涉及「國家認同」的重要問題。M17 陳先生在「中國範疇」有類似的聯想：

老兵吧！我小時候住在高雄岡山，我家附近有很多外省老兵，我們好像互動的還不錯，因為我很多外省同學，我家附近就只有一間小學和一間國中，所以，我們大部分都會同班或同校很多年，彼此還算熟，所以，我知道他們的生活其實不是很好，而且很多外省人好像都娶本省人當老婆，就是腦袋有問題的那種。

我應該還算同情他們，因為他們有很多都是被國民黨騙來台灣的，福利好像也沒有很好，生活好像也很苦，有的好像也沒錢回大陸。

(研究者問：你覺得他們會想回去嗎？)

不是很清楚，好像...，我聽我有的同學說，他們其實對大陸人沒什麼好感，因為太愛錢了，每個回去過的外省老兵，幾乎都有被騙錢的經驗，而且有的甚至錢還被騙光了以後，踢回台灣，有的，不知道是氣瘋了，還是怎樣，聽說有的就這樣死了。所以，他們好像都寧願回台灣娶大陸老婆，不想再回去。

(研究者問：你覺得他們為什麼還是選擇回台灣？)

不是很清楚，不過，我想可能是來了台灣很多年吧，而且，如果不喜歡台灣的話，應該都會回去大陸住吧。

(研究者問：你覺得他們會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嗎？)

可能吧，都來了這麼多年，如果還只是認為自己是大陸人，那也太說不過去，如果是那些回去了不回來的就算了，但如果是去了又回來的，還一直只說自己是大陸人，或是中國人的話，也太點點了！(研究者註：不知道該怎麼說時的流行語)

F12 鐘小姐的強烈回應：

如果外省人，還認為自己不是台灣人的話，就該回去大陸，不要出現在台灣。不過，有時台灣人也要自己檢討一下，選了一個這麼爛的總統，也難怪人家不想承認自己是台灣人。

M11 彭先生的想法比較客觀，他覺得：

外省人也是台灣人，不過中國大陸是他們的故鄉，可能他們現在還有家人在那裡，台灣也可能有家人，如果要他們只選擇一邊，好像也說不過去。

F12 鐘小姐和 M13 的鐘先生是兄妹，兩位的國族認同理念非常一致。不過，他們的家族不盡然有相同的政治信仰，例如他們大伯父一家就相當認同中國人的身份，更認為民進黨執政後推行的本土化運動是一種對於中華文化的破壞，台語或原住民文化的提倡，在他們看來，更是一種選舉活動的炒作，根據 F12 鐘小姐轉述，當她提及客家語和客家電視台問題的時候，她的大伯父及堂兄弟，竟回答：「那不一樣」、「我們現在講的是民進黨本土化運動對於中國文化的破壞」、「重點不是語言」、「奇怪，我們客家人怎麼會有你們這種台客變種」、「要不要說句台灣國語來聽」。承前 M13 的鐘先生的國族敘事，這些對話顯現亦印證了一個現象，亦即根植於國民黨政權思維的教化政策，精確的說，亦是蔣氏政權的殖民主義，通常是透過系列的國族建構活動包括歷史意識、社群意識、宗教意識、文化意識及語言系統的重製，以解消特定族群對於外來的族裔文化、政權統治與身份認同的壓迫感，繼而經由國歌、國旗、國語、神話、英雄、教本、敘事、等傳播系統，營造「國族共同體」的想像與情感，甚至是警政體系交互運用的領導，因此這些國族無意識的構念重合「過去性」及「歷史連續性」的敘事，不自而然顯現過去國民黨政權延伸日本殖民制策繼而對於台灣人民厲行再殖民的粗暴軌跡。亦即，過去國民黨政權的中國意識旨在宣揚其特定的國族認同，除了用以合理化其政治壟斷的統治威權，更藉由語言的使用、高低文化的設定、職業升遷的條件、政治資源的分配等政治標準，區分族群身份及其價值的優劣，繼而吸收受宰制族群，使其接受、認同宰制族群，為其鞏固統治正當性的基礎。若以後殖民論述延伸，即是確保可殖性與依附情節的有效延續。準此，當前仍有許多的台灣人誤認族群身份僅在政治層面造成社會對立問題的錯覺，進而模糊了國族意識的正確指涉，尤甚是出現一切皆為政治炒作的論點，亦使得台灣國族認同背負「台客原罪」，成為台灣部份地區人民的土俗象徵。若將蔣介石重合威權體制的殖民教化政策，視為歷史斷層的起點，後殖民論述對於當前國族認同混亂現象的探討，勢必顯現 H. K. Bhabha 以雙重時間為視角的國族抹滅記憶。亦即台灣人是三民主義訓示下

的歷史對象，一黨傾斜的中國認同是本於該黨對三民主義既定的、構作的或發明的國族內涵，目的除了為鞏固蔣氏政權的統治基礎，更為蔣氏家國的過去性歷史源頭提供論述權威。這種看似人民作為主體意義的國族表述，僅存抹除特定社群由來的目的，尤者是覆頌殖民者的國族再生產敘事，甚而台灣人在抵抗遺忘自己族裔的記憶與解除殖民心理束縛的同時，不斷面對這個外加但也自內分裂意識的拉扯，亦是後殖民論者謂之在帝國及殖民主義離境的殖民地地區，受殖者對殖民者的模擬與學舌早已內化成集體無意識的行為模式。

比較其他幾位受訪者後，發現一個共通性的現象：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受訪者包括 M11 彭先生、M15 許先生、M16 郭先生、M17 陳先生、F9 林小姐、F12 鐘小姐、F13 王小姐、F14 林小姐以及 F16 黃小姐，通常覺察到自己過去的中國認同是受國民黨政權教化的結果，不管是來自教科書的內容或是為例行性的國家慶典、特定人物的紀念日、誕辰日等所舉辦的系列活動，在他們的認識中，均隱含某種特定的意識型態，更有阻隔台灣人與自己的土地及族裔歷史、文化的目的。M16 郭先生認為：「國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自己無法面對自己戰敗事實的記錄」，而 F16 黃小姐以自己孩提時代記憶和我們分享她與上一代的隔閡：

我在台北市出生，也在這裡成長、就學。我的爸爸、媽媽從來沒教過我台語，那個時候我沒有其他的感覺，有時也覺得台語很怪，就好像只有台客和台妹才會說的那種。而且我不喜歡在公開場合講台語，感覺就是怪。

(研究者問：那為什麼你現在在學台語？)

好像是高一的時候吧，我去台南看我阿公，那時候他住在醫院，身體很差，我坐在他旁邊，很想和他說說話，但是，我們兩個就是聊不了幾句話，因為我的台語真的很不好，也聽不太懂，他生病了，也沒力氣和我比手劃腳...，應該也沒力氣聽懂我講的國語...。他還沒生病以前，我們都是雞同鴨講，他會說一點國語，我會說一點台語，有時候，比手劃腳也還可以溝通...不過，他快去世時，我竟然沒辦法讓他聽懂我要講的話。我每次想到這點，我就很難過...

有時想想，以前我也很差勁，因為我以前覺得我的阿公和阿嬤，還有一些我住在南部的親戚，很怪，就是...(她用一個表情帶過)，不說了，現在想想實在...

(研究者問：你為什麼會那樣的感覺?)

或許是受的教育吧，那時候好像大家都這樣吧，覺得台灣文化好像很低俗，什麼電子花車、檳榔西施、還有廟會和喜宴都有脫衣舞，好像還有民進黨不知道為什麼總是在立法院鬧事、打架，那時候好像覺得只有台灣人才會這樣。

F16 黃小姐的故事不盡然可以解讀成國民黨政權對於台灣文化的壓抑或特定價值的扭曲，不過，比較令人好奇的黃小姐的心境轉折，從「學台語」到「不學台語是因為教育的關係」，再到「台灣文化的低俗」、「只有台灣人才會這樣」的敘事觀點，得知黃小姐的言詞使用與敘事目的存在相互參照的關係，而對於自己重新檢視自己身為台灣人的敘事過程，亦由一個「學與不學台語」的觀點轉換到另一個「情感聯繫」的對應觀點，由表示敘事構想的「受的教育」轉換到「只有台灣人才會這樣」的言詞使用，最後再回到自己是「台灣人」的敘事構念，準此，主觀者建構的敘事情節及敘事內容原確實存在的多重觀點詮釋，但透過敘事者的話語內容與多重觀點陳述間產生的斷裂，卻可探究到客觀現實及其先於情節存在的構想與意念。按 F16 黃小姐的國族敘事，研究者推知國民黨政權的教化政策，存在隔離台灣人與自己鄉土文化的目的，尤甚為區分族裔文化優劣的價值設定。

當然，這個教化政策對於其他受訪者並不全然等於「殖民同化」，至少，對於部分外省族群不是，也不一定適用於認同自己具有「兩種身份」即「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台灣優先抑或「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中國優先的受訪者，不過，誠如 Jonathan Culle 認為敘事者的構想或意念是故事情節呈現意義的基礎與視角，在這些幾乎沒有實際中國經驗或當代中國歷史淵源的台灣人身上，確實發現當他們提及對於中國、中國人及中華文化，甚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國大陸的想像時，竟然與外省籍的受訪者顯現高度相似的國族敘事觀點，證實話語形態不管為何，本就存在多重意義的詮釋空間，而其構念卻從未改變，所以我們

總可在敘事言詞的置換中，找到「支配階級」剝削與壓迫的事實，以及「受支配階級」集體無意識的意識認知或表現。若以 Foucault 的「知識考掘」方法為議，對於這種國族認同所呈現的後殖民現象，最具意義的脈絡理解便是經由具有相同族裔背景的台灣人的不同發聲，重新拼湊他們在同樣國族脈絡的差異見解並描述另外的族裔聚合景觀，繼而從該文化景觀的縫隙，找尋歷史與論述之間不連貫的表述文本，再重返殖民場境，進行客觀分析。以下是 F17 楊小姐的說明：

我認同我是台灣人的事實，但我也認為我是中國人。不過，我對於台灣人的想法是指我的出生地，不代表我的國家認同，還有，我是台灣人，但不是台妹，我更不喜歡台客，也非常討厭台灣國語，我不會和這種人走在一起。

所以，我很不喜歡過年的時候回彰化老家。我小時候在那裡住過一段時間，我真的很受不了，好多人都喜歡嚼檳榔。幸好，我讀國中的時候，我們全家搬到台北三重，雖然那邊還是有許多台客，但比彰化好多了。

前幾個月，我去了大陸，我去上海幾天。說真的，我還滿喜歡那裡的感覺，感覺上很進步，長江真的好大，從東方明珠塔看下去，真的好有感覺，真的也和我們以前的歷史課本寫的一樣，是一個充滿各國人文和建築特色的大城市。

有時候，想想，台灣還真的很小，也沒什麼文化，建築物也很醜，也沒什麼特色，如果有機會，我真想住在上海，雖然我不是很喜歡大陸人，有的真的很窮，感覺上好像每天都在撿破爛，這個也和歷史課本寫的情況很像。

對照外省族群的中國經驗與泛華人性的中國特質，本省籍或客家籍的受訪者對於中國性或中國人的想像，某種程度上，是被歷史、生活方式、語言符號內化的自我認知模式，彷彿科學怪人(Frankenstein's Monster)有了自己生命以後，屆時在創造文化或賦予文化生命的常民及其活動網絡，反受其形式牽制進而拘束生活內容。F17 楊小姐認為上海很有西方文明的城市氣氛，但也對部分當地人的貧窮與環境的髒亂感到不適，雖然注意到文明本身隱含的文本敘事是某種刻板印象的呈現，不過，相對深層的文化意義與文明隱憂卻也視若無睹，尤其是讓他國文化

的傾慕概括了自己文化價值的認識，這種對於他者文化景觀的反應，充滿殖民式文明建制的意味，亦即國民黨政權透過中國單面想像但也傾斜歐美的教化政策，在台灣人的國族認同中，安置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國」、「中國人」及「中華文化」，甚至是「西方文明」的集合性他者，某種程度上，亦是一種受殖者在後殖民性的另外自我鏡像，經由這個「他者化身」的自我認可及對照，台灣人有了中國認同的模倣對象，在國民黨政權構作的意識型態及道德規範中，尤甚者是訴諸文字的典章制度與明文規定的人際交往，分配到已然定型的角色並照本展演。

準此，研究者認為，討論台灣當前國族認同的困境，不管是具有中國認同或台灣國族認同的群體，必須對於「完整台灣性的不可行」與「雙重殖民歷史及其斷裂詮釋」的問題保持警覺，亦即內戰失利的蔣氏政權在退守台灣後，透過黨國一體的國家機器極力運作一套承帝國主義外延的啓蒙思維，以建構個人家國為之「殖民霸權」目的，將「外省人」與「本省人」化約為兩大族裔單位，而客家人與原住民僅被暴力地概括於後者，經由雅俗文化的標籤、地大物博的幅員、歷史悠久的想像、國仇家恨的轉化，私人恩怨的延伸，約縮「台灣住民」對殖民壓迫的認知，繼而台灣國族意識對應於中國的國族覺知，內隱成為若干族裔對其身份價值認知及國族認同的焦慮，創傷的經驗經由殖民話語的扭曲、變型、反覆轉移、乃至淡化受宰制者的集體記憶或意識型態，因而，承受諸多帝國主義侵略及殖民統治的台灣歷史，其台灣性的完整與過去性是不可得亦不必要的挑剔，排除中華文化的歷史詮釋亦將僅是徒添台灣國族的論述矛盾，尤甚是重覆殖民霸權暴力。換言之，在台灣國族認同的論述過程，對於「台灣」或「中國」在一般人民心中的認知差異必須加以注意，亦即台灣國族的政治正確詮釋，通常不自而然聯通了以民進黨為核心的台灣國族主義，更以右派的中華國族主義為參照，其「中國」的概念亦存在文化中國、疆界中國、政體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及蔣介石以個人家國為視角的中國想像、中華文化正統、中華民國或另外中國政體發明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短時間這種為僵化心智模式所捆綁的中國認同或台灣國族認同，

難以抒解。不過，研究者在資料分析卻也發現，台灣人的國族認同意向目前慢慢朝台灣國族認同的方向修正，即便中國崛起、民進黨執政的效果不彰、二次政黨輪替是影響認同強度的中介因素，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的事實仍逐漸受到肯定。受訪者當中的 M11 彭先生、M15 許先生、F11 葉小姐以及 F12 鐘小姐均有此感，其中以 F11 葉小姐的見解最為深刻：

我很認同台灣需要成為一個國家的觀點，這就像國民黨以前一直要我們唱的一首歌一樣，就是「沒有國，那裡會有家，是千古流傳的話」，你聽過吧，歌名我忘了，但我知道，我們小時候只要是國慶日附近的時間，學校老師都會教我們唱這歌，好像電視也一直播這首歌。我以前唱這首歌的時候還滿有感覺的，心裡真的有想過，有一天，我們反共大陸去解救那些可憐的大陸同胞，而且這個想法還持續了很久，好像一直到我念大學，不知道大幾，不過，我知道，我開始覺得這種想法不對勁是因為有一次聽了一位老師的演講，我不知道是誰，不過我那個時候慢慢發現中國和我們台灣根本不是國民黨說的那樣，再加上從我的記憶中，去回想一些國民黨做過的事，真的發現我們是被國民黨騙了，他們會來台灣根本不是自願的，是因為打輸共產黨，才逼不得已來了台灣，而且還殺了很多人。

不過，我也不因此認為民進黨有需要一直提這些事，因為國家的發展總不能一直局限在這種仇恨的循環，而且現在中國大陸的發展越來越好，台灣是應該要加油，因為這樣下去，台灣真的會越來越被邊緣化，這是我們很不想看到的結果，畢竟，我們都是台灣人，我們和這塊土地有深的感情，也和這裡有很深的聯結，台灣不好，我們也不會好到那裡去。

此外，研究者在訪談的過程中，另有外於這種普遍性的台灣國族認同趨勢的發現。接受訪談的六位原住民籍受訪者，分別來自不同的部落，包括 M1 全先生是從南投到台北工作的布農族、M2 林先生是住在新店但故鄉在花蓮的阿美族、M3 金先生住在高雄市但故鄉是在高雄縣桃園鄉的布農族、F1 王小姐來自高雄縣桃園鄉但在台北縣某間小學任教的布農族，F2 吳小姐來自桃園縣復興鄉但現在

在台北市某高中任教的泰雅族、F3 金小姐是從南投到台北讀書、工作的布農族。對於台灣人的身份是感到遲疑的，他們全部一致認為自己不是「純的台灣人」，也普遍認為，台灣人的身份隱含強烈的漢人認識，但中國人的身份更讓他們感覺到不自在，M2 林先生及 F1 王小姐甚至於認為中國人和日本人同樣殘暴，如果真要他們有所抉擇，除了 F2 吳小姐外，他們比較兩種身份後，寧願選擇台灣人，畢竟，無論是歷史淵源或地緣關係，「台灣人的身份和中國人的身份做比較的話，我對台灣人比較有熟悉感和親切感，而且當台灣人好像比當中國人，真實一點」〈F1 王小姐〉，其中，M1 全先生、M2 林先生、M3 金先生、F1 王小姐、以及 F3 金小姐更是強調：民進黨執政後，陸續推動的本土化運動或存在「福佬沙文主義」，但對於原住民文化的提昇卻也有所實益。F1 王小姐認為：

台灣本土化運動有很重的漢人意識在裡面，可能對於我們原住民造成壓力，但是比較兩個政黨，不可否認，民進黨對我們原住民是比較重視，也比較尊重，至少現在我們有自己的電視台，雖然我覺得節目不是很好看，但這就已經不同了。

M1 全先生的感受與 F1 王小姐類似，雖然「原住民電視台的節目都很爛」，但是「想想，有自己原住民的電視台，也已經很好啦」。

F3 金小姐比較「福佬沙文主義」和「中華沙文主義」後，認為：

我爸爸告訴我，他以前很怕搭公車下山到台中讀書和放假回家，因為他每次把手伸出去拉公車手環的時候，都覺得自己的手很黑，很不好意思。

他還有說，他很不喜歡上課的時候，老師叫他，因為老師和同學都會笑他的國語很爛。我有時候，想一想，民進黨執政也沒什不好，反正大家國語一樣爛，不過，這好像也是真的，因為現在我比較不會覺得講原住民話不好，也沒有我爸被笑的感覺，而且，好像現在國語講的標不標準也沒那麼重要，也好像不流行。

從這段「對話」，或也得知國民黨政權的國語政策存在一種全面性壓迫，而且受壓迫的對象是不分省籍的台灣人。據此證實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是一個殖民社會。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原住民都認同台灣人的身份，其中，也有不同聲音，

F2 吳小姐就認為自己也是中國人，在她的認知，中國人是接受中華文化薰陶的群體，但在研究者反問「日本人及其他的亞洲民族是否也因此算是中國人」後，她將中國人的認知修正為在中國大陸與台灣的群體，除了外籍人士外，他們只要認同中華文化，就是中國人。這種說法和楊渡的見解相似，是一種概括式的侵吞，不過，以 F2 吳小姐的族裔身份為視角，卻也覺察到 W. E. B. Du Bois「雙重意識」的另外軌跡，亦即原住民的族裔文化與類似種族差異的體徵讓她產生了「先斷裂後認同」的衝突與妥協，亦即她明白台灣人的身份是一種國族歸屬，但這個國族歸屬在從「中國」轉換到「台灣」的過程，對她的族裔身份確實造成衝擊，知道自己是具有某種清晰種族體徵的原住民的同時，她把體內的自己斷裂成「兩半」，一半是台灣人，一半是中國人，而她的原住民身份便成為包裹這兩個對半的整體。

準此，國族認同確實具有不能被規約於特定族裔的傳統準則抑或種族的判斷標準的屬性，亦無法完全抽離自「受殖」與「殖民」以及「壓迫」與「受壓迫」的歷史發展，因而，如何自深植台灣人心的意識型態中，解放他們對於族裔文化及其國族認同的焦慮反倒成為解殖的重點，當然，省思解殖進路的同時亦須對於「當代人群」對於改革反動的茫然與排斥問題有所關注，繼而認清當前台灣國族認同的困境，莫過於完整台灣性的不可得與不可行，而台灣的雙重歷史及其斷裂詮釋，必然面對國民黨政權外加教化意識與部分台灣人自內集體無意識的挑戰。

此外，研究者也發現，部分台灣人的「雙重身份」存在「雙重國籍身份」的相似性，這與 Homi K. Bhabha 認知的「雙重身份」有所差異，亦即台灣人自為「中國人」與「台灣人」的身份認知具有雙重國籍的傾向，即便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前提，也難以認同自己的中華民國所聯結的中國國籍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侵吞的事實。Bhabha 的雙重身份比較接近 Eric Liu 華裔美人及 W. E. B. Du Bois「雙重意識」的認識，亦即承認自己具有外於所屬國族團體的特殊種族體徵與族裔傳統、文化，不過，對於自己的國族歸屬相當清楚，也甚為堅定。再者，Bhabha 等後殖民論者與 Du Bois 等反國族本位主義論者的

國族覺知與雙重意識的訴求，在排除殖民者壓迫的主體重建以及要求公平、對等的國族權利，換言之，如果台灣原住民認為他們有需要成爲一個國族團體，抑或是覺得被該國族團體排除於外，他們的主張與訴求甚至是反制行動便可能存在 Bhabha 等的雙重概念。同理，相對於過去國民黨政權的壓迫，台灣人如果認為他們有需要成爲一個國族團體，抑或覺得被該「中國」國族團體排除於外，亦可循著後殖民論述脈絡，主張成爲一個具有主體意識並訴求主權獨立的國族團體。

當然，該論證背後存在推導過程的邏輯問題，亦即並非所有的台灣人都認為「需要成爲一個國族團體」，抑或「覺得被中國排除於外」。根據研究者比較具有中國經驗的外省籍受訪者與較少甚至毫無中國經驗的本省籍、客家籍及原住民籍受訪者，在「我是中國人」及「我是台灣人」等範疇問題的訪談資料後，尤甚在「認爲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的前提下」以及「台灣應該成爲一個國家」的敘事斷裂中，發現部分台灣人「雙重身份」所存在「雙重國籍身份」的相似性，甚至是一種自利的、趨附的、白帝的及白華的「國家選擇」，是承襲過去蔣介石一黨傾斜的單向國族認定以及自爲「血統精純」的中華文化想像所導致的教化結果，除了隱含一種重合西方帝國及殖民主義的族裔聚合外，更有一種宣稱解放台灣人但事實上卻是假借啓蒙智識壓制並奴化台灣人潛能的設計，若以該符碼系統進行台灣族裔的認識，往往僅是將對比中國但顯現與中國文化脫節的台灣文化，認識爲「遲到的現代性」，甚至將部分台灣人因爲受日本殖民統治而顯現的皇民認同思維解釋成「天生的低下性」，而這種扭曲亦連帶將蔣氏政權的中華民族主義，合理化爲壓迫台灣文化的正面性與必要性，單向教化台灣人成爲中國人或是中華民國國民的同化政策，有了昇華台灣人的族裔身份以及台灣文化歷史性的「神聖使命」，因而，接受這套思想體系的台灣人對於國族認同的覺知產生一種「雙重意識」的焦慮，甚而，支持台灣成爲一個國族團體的思考，成爲「破壞社會和諧」與「導致中共武力犯台」的毀滅性狂亂錯覺，台灣人在中華民國來到台灣的偶然時空中，偶然的成爲了中國人。

第四節 中國人觀點的國族敘事

中國對於本省人、客家人、原住民而言，必然與外省人有所不同。「故鄉」是不是「原鄉」？「故鄉」是否能夠等同於「家鄉」？僅是這兩個問題便讓他們彼此之間有了差異的敘事方向，如果再將「中國」變成「中國人」，聯結「故鄉」與「原鄉」的文化根源思考，更是混雜了「中國」與「中國人」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在彼此心靈經由不同程度的經驗、記憶而有不同的想像、情感，無意間可能按著「海森堡記憶法則」將「文化中國」美化成「中華民國」的歸屬，甚至使得台灣成為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地，因而「中國大陸」成為任何來自「中國」的「中國人」的原鄉，即便部分他們不認為自己屬於那裡，或事實上，也從來不屬於那個遙遠夢鄉，但在三民主義的規訓下，特定的歷史事件的選擇、詮釋、發明中，尤甚是暴力脅迫及殖民教化的壓迫裡，成了不得不的「中國人」，無論願不願意，也都被賦予解救中國的時代精神與開化任務，不同意就是附匪。

外省人認為台灣小，我們可以理解，因為他們來自大江南北，內戰時，東奔西跑的逃難，或也見證了中國大陸的廣大幅員。外省人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或無這種實戰經驗，但透過家族真實記憶的傳承，或有深刻、意義的聯結，亦是無可厚非的事實。不過，我們好奇的是，為什麼經過這些年他們並沒有和 Eric Liu 產生相同的國族覺知與認同，總是無法忘懷自己來自中國，誓言「生生世世做個中國人」，但卻一直住在台灣？其中，更令人費解的是，許多本省籍、客家籍的受訪者不斷重覆著和外省人同樣的話語：「台灣太小了」、「台灣很亂」、「台灣比美國落後」、「台灣快要被中國大陸邊緣化」等，但說著這些話語的同時，這些人卻還是站在台灣的土地上，未見他們有移民出走打算或是移民出走的經濟能力。M19 蘇先生如此回應：

台灣真的很小。台灣的學歷沒有公司會喜歡。他們比較喜歡用外國研究所的畢業生。要不是我現在還沒有存夠錢，我是不會留在台灣讀研究所的。我寧願去

上海或北京讀，都不要留在台灣。台灣太小了，也不夠國際化。還有，現在台灣這麼混亂，民進黨這麼貪腐，我寧願選擇以前威權時代的生活，至少比較安定。

(研究者問：那你覺得大陸的學歷也會比較受歡迎嗎？)

應該也會吧。現在那麼多公司去了大陸，他們應該也會比較喜歡那邊畢業的人吧！我的一個大學同學，一畢業就去上海讀研究所，現在在大陸，聽說好像，還不錯。我其實還滿想去的。只是，我還沒有畢業。以後我應該會去大陸工作吧！

M19 蘇先生現就讀台灣北部一所知名私立大學的企管研究所。家裡的經濟狀況中等，爸爸在私人公司上班，擔任主管職位，媽媽在公家單位任職。家裡有弟妹各一人。從這樣的描述發現 M12 林先生的家庭是典型的台灣家庭，不過，比較特別的他們全家都嚮往中國大陸的生活與發展，當然也包括對於台灣本土化的反感及台灣不夠國際化的認知。研究者曾試著詢問他關於外國與大陸研究所的認識，但得到的答案均僅限於想像，從無深刻的想法或說法，而所謂「一個大學同學在大陸，還不錯」的事，亦僅是聽說，因為他們不熟。至於，自己畢業後，去大陸工作的事，目前還只是計劃階段。對於這種中國聯結美好前程、外國代表國際化的想像，M8 黃先生亦有類似的說法：

台灣很小。我們不能老是把自己綁在這裡。我知道本土化是一種趨勢，不過也不能當做是不進步和貪腐的藉口，台灣的產業不斷的往中國外移，這不是一件好事，但也不是壞事，因為大陸什麼都便宜，人工很便宜，材料很便宜，吃也很便宜，住也很便宜，還有現在全世界的大公司都去了大陸，機會應該比台灣多。

我今年九月要去出國，要去上海，我爸爸要我去那裡，看看環境，順便找間學校讀讀書，發展一下人脈，將來去工作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研究者問：你有沒有考慮過去國外讀書？)

我有想過，但是我覺得現在全世界都往中國大陸跑，我去美國也不知道能做什么？而且我大概小學的時候，已經去過美國讀書了，現在想去大陸看看。

通常「國外」的概念在台灣等同於「美國」，是一種虛無縹緲的「美國夢」，

或許對於特定群體而言，那是真實的、可觸碰的、亦是可實現的，但是這個真實卻也存在一廂情願的問題需要討論，不然，現在為什麼還有許多滯留美國，過著比二等公民還不如的生活，而且有家歸不得的華裔中國人或台灣人？同理，目前中國也有許多「台流」，一個帶著中國夢，去了大陸，夢醒了，錢沒了，臉丟了，回不了台灣，也不知道去那的落迫台商團體。過去台灣人對於「國外」的想像，某種程度上，與現在對於「中國」的想像是相同的，亦即到了美國如同就能立刻變成美國人，身份和地位便與眾不同；現在去了中國，似乎也好像立刻就有發展，更能揚名立萬。這種區域聯結種族優越感、文明高尚想像、經濟前景看好的思維透露出帝國及殖民主義來去受殖地區之間，留下的並不盡然是全新時代，反倒是對殖民宗主國的依附與嚮往，尤甚是精神負擔與洗腦的現實。過去在蔣氏政黨的威權體制下，不管是教本內容、報章雜誌、影視戲劇，無不極力推崇歐美價值，曲解日據歷史與台灣文化。其中，對於美國的想像更透過語言的學習與生活習慣的推銷，彷彿不說個「Yes」、「Thank you」、「No problem」或是「Come one」，就不「International」，而吃飯如果不是去西餐廳的話，好像就土俗了，尤其是，在電視或電影畫面中，重覆著穿著台灣農村服飾的類型人物在西餐廳鬧著笑話，夾雜台灣國語與聽不懂英語的尷尬場景。因此，受國民黨教化的台灣人開始覺得台語土俗、台灣人土俗，於是盡力學好英語、國語，也盡力忘記自己是台灣人的事實，想像自己在地大物博的中國，有著美麗景致的家園，希望有一天能夠回到祖國，「完成一種循環，為自己加入某些欠缺的事物」，於是台灣人身份認同要先經過斷裂，斷裂成為「中國人」和「台灣人」，甚至是「本省人」與「外省人」，在中華民國的文明屬性跟前，對比民進黨的本省土俗特質，就算是他們具有台灣主體性的認知，在不願意錯認「民進黨」為台灣性代表的同時，出現「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國家選擇與時代錯誤，一錯再錯或是將錯就錯的情境讓我們自我淪陷新殖民的浪潮中，再次犧牲了「台灣族性」，尤甚者是強化了台灣國族的地緣性與可殖性。M8 的黃先生這樣告訴我們：

我的一些朋友，包括一些外省籍或是從中南部上來台北工作、讀書的，都說他們很溫和，他們不會認同民進黨，而且他們也覺得台灣很小，應該往大陸發展。

聽完 M8 黃先生的一席話，研究者心理躊躇著一個想法：「台灣再怎麼小，小得過我們住的地方？我們的家？學校？親戚家？還是我們遙遠的中國原鄉？中國再大也不是全部屬於任何自稱為中國人的個人土地，台灣再小也還養育我們這麼多年，千千萬萬的台灣人包括 M8 黃先生難道不是正生活在台灣的懷抱裡？

M5 胡先生也有這樣的想法，並對於研究者某些訪談問題有所質疑，他認為研究者的問題存在一種「分離主義」的傾向，因為他堅持「大家都是中國人」，也認定自己是「在台灣出生的中國人」，而且還用英文這樣表示：「a Chinese in Taiwan」，因此不管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都好，應該不分彼此。至於，要不要「一起為 Chinese 奮鬥」的問題，他這樣說：

我沒那麼鄉愿。大家自個兒顧好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別管那麼多。

(研究者問：你在大陸工作的時候，生活上沒有適應的問題嗎)

有。我不喜歡大陸人。他們人和人之間，是沒有什麼情感的。我不喜歡那種感覺，好像眼裡看到的只有金錢。

(研究者問：你回台灣會不會比在大陸輕鬆，我是指治安的問題。)

還好。我住的地方，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武警，周圍都住外國人和大陸官員，你說，會有什麼問題？可能還比台灣安全吧。

(研究者問：你說你曾在大陸住了半年，那你覺得台北在那半年有改變嗎？)

沒有。(想了一下)如果有的話，應該是街道乾淨了一點，路旁裝了一些路燈、廣告之類的。其實，我倒還蠻常回台灣的，你問我不準。不過，我爺爺或是其他親戚回台灣，也跟我有差不多的感覺。台灣沒什麼改變。

M5 胡先生的談話再次證實了，若以「省籍差異」思考台灣國族認同的問題，必須注意「階級」存在的歧異性。以胡先生的家世，不管是蔣介石的威權時代或當前民進黨執政，甚至是連帶中國崛起引發的社會問題，均不會對於他們的生活

造成太大或太多的影響。或許胡先生出生在台灣，不是在美國，否則我們便可以比較胡先生與 Eric Liu 在國族認同的差異。不過，就另外角度思考，胡先生沒有產生與 Eric Liu 同樣強烈的「國族認同」，或與蔣介石一黨傾斜的教化政策有關，因為 Eric Liu 是一位自願移民歸化的美國公民，是華裔美國人，不是在美華人，而胡先生是一位非自願遷徙台灣的外省第三代，這從他的家族親戚全都移民外國可以證實，請注意，是全家移民包括在台任教的父親及他自己，都擁有美國護照。台灣對於他們而言，這是暫住的地方，甚至連「異鄉」都稱不上，因為他們全家選擇美國或加拿大作為最後落腳的「異鄉」。因此，胡先生認為台灣很小，可以被理解，也應該被接受，畢竟，他們都離開了台灣，也去了別的國家。換言之，即便他們不認為台灣曾經給過他們什麼，或是讓他們渡過幾些安定生活，至少，他們現在不在台灣，也有能力離開台灣，但那些走不了，又成天抱怨、批評的人？我們沒有選擇父母的權利，或許有的人有權力，不過，我們應該要檢討自己有沒有改善「家裡環境」的能力，反動的忿然與歷史的默然僅是推著自己變成別人想像的別人，最後變成「亦此亦彼」也「非此非彼」的無國家之人，或簡稱為無人？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外省人是抱持著「過客心態」，只是我們好奇，為什麼至今仍有為數不少的人保有這種想法？甚至連部分毫無中國經驗、記憶或是從無去過中國的台灣人，都有類似的想像。中國，一個曾經因為歷史及內戰帶給他們傷害的「故鄉」，對比台灣，反而是一個讓他們安定生活數十年的「異鄉」，其中或有高格孚謂之的「複雜過程」，不過「中國的好」抑或「台灣的不好」的原因，僅能說是原鄉情愫與異鄉原罪的攪擾？或是如 Eric 所說：「中國人會離開中國，但是中國永遠不會離開中國人」？這不得而知，也無從得知，畢竟，那種情愫與原罪或是與生俱來的印記，或是一群因語言、歷史與文化的相似特質，在彼此之間產生一種命定式的我群情感，據此與他群差異有所區隔，而所謂「祖國」或「家國」的意義或可外延於此，原鄉情懷或可由是形成，繫著個人對於家庭或是出生地的歸屬感聯結，讓他們聯想起血源、父母、親屬、故鄉，甚至於曾經歸屬

的國家。不過，按另外的層面思考，除卻這個家國與祖國的客觀條件，為何部分本省籍與客家籍的台灣人無法在同個敘事脈絡，聯想起自己台灣的血源、父母、親屬、故鄉，反而拖著一條黃黃的中國繩索，說著「因語言、歷史與文化的相似特質，所以『我們都是中國人』」話語？準此，根據研究發現，相較於台灣人在日據時代的中國認同所存在文化母國的思考，若以「中華民國」作為「反共復國」的中國認同，或僅是特定團體在個人家國的想像與政治象徵，而兩者截然不同的思考卻在國民黨政權的殖民教化運動中融為一體，導致台灣當前國族認同混亂的歷史源頭並為「中國即中國人·中華民國即中國」的霸權提供了論述權威。

F18 謝小姐這樣證實：

前年，我和我一群高中同學去長江三峽玩。我們看到長江大壩的時候，其中有一位中年團員突然大聲的說：真是厲害，比我們的石門水庫洩洪的時候，還厲害。我們之後開始聊著台灣和大陸的差別，重點是，我們在大陸看到的，好像回到以前讀書的時候，從課本想像中國的那個樣子，雖然不太一樣，不過，落後的感覺和河山的壯觀是差不多，重點是，我們都有回到自己故鄉的感動，而且我們還異口同聲的說，因為我們是中國人。

我當然也知道，現在在台灣，不太流行中國人的說法，因為我們幾乎是都在台灣出生和長大的，但是，你去看看，那些真的是和我們小時候想像的中國很像，所以，我覺得，台灣太小了，如果我們只是承認自己是台灣人，好像不太夠。

所以，我覺得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但不是大陸人，畢竟，我們的文化不同、歷史發展有差異、生活水準、受教育的程度都不同。

F18 謝小姐中國認同的呈現一種語言與構念的斷裂，她先前曾在「中國」與「中國大陸」的聯想中，把中國等同中國大陸，但卻在「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但不是大陸人」的敘述中，將「中國人」與「大陸人」割開，亦即當台灣人提到中國的時候，這個「中國」是「文化中國」亦是「疆界中國」，也可能是蔣介石在教本內容設定及描摹的「個人家國」，不過，當「中國」的命題變成「中國人」，

聯結「家鄉」(出生地或居住地)與「原鄉」(祖先的來處)的現實思考，便混雜了「中國」與「中國人」這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在彼此心靈經由不同程度的經驗、記憶而有不同的想像、情感，按著「海森堡記憶法則」，將「文化中國」美化成「中華民國」的歸屬，甚至「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聯結，使得中華民國經由文化中國的歸屬，成為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地，因而「中國大陸」成為任何來自「中國」的「中國人」的原鄉，但住在中國大陸的大陸人成了無家可歸的「非人」，用一個簡單的邏輯概念說明：

$$\text{台灣人} = \text{中國人} \quad (A=B)$$

$$\text{台灣人} \neq \text{大陸人} \quad (A \neq C)$$

$$\text{中國人} \neq \text{大陸人} \quad (B \neq C)$$

不過，大陸人本就是中國人，因此，按該邏輯推論將會產生令人匪夷所思的結果：

$$\text{大陸人} = \text{中國人} \quad (C=B)$$

$$\text{中國人} = \text{台灣人} \quad (B=A)$$

$$\text{台灣人} = \text{大陸人} \quad (A=C)$$

當然，這個邏輯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其一，它對於台灣外省第一代來說是成立的，因為他們早期被台灣人/本省人稱為大陸人，但是這個等式卻在他們的族裔代間(generation gap)被推翻，亦即第一代、第二代及外省第三代之間，對於大陸人的身份是有差異的，或指來自中國大陸的外省人，或指中國人、或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其中的「中國人」，可能是文化中國、疆域中國、中華民國的中國；其二，它對於具有台灣國族覺知與認同的台灣人而言，甚至是其他國家的「外國人」，是無法成立的。用這些人的邏輯可以推論成：

$$\text{中國人} = \text{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quad (A=A)$$

$$\text{台灣人} = \text{住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國民} \quad (B=B)$$

$$\text{中國人} \neq \text{台灣人} \quad (A \neq \text{非} A)$$

$$\text{台灣人} \neq \text{中國人} \quad (B \neq \text{非} B)$$

以「台灣人 = 住在台灣並不認同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國族團體」代替，同理：

中國人 \neq 台灣人 (A \neq 非 A)

台灣人 \neq 中國人 (B \neq 非 B)

當然，也有人可能會說：「大陸人就大陸人，反正，大家都是中國人，沒差」，M12 林先生、M14 許先生、M18 黃先生、F15 陳小姐及 F18 謝小姐，均有類似見解。不過，我們發現外省籍的受訪者對於這種「國族無意識」比較保留，就連相當堅持中國認同的 M9 謝先生、F7 劉小姐及 F8 鄧小姐都無接受將「大陸人」完全等同於「中國人」的說法，幾乎是一致的認為，他們「是有文化的中國人」，和中國大陸的「大陸人」是有差別的。

準此，引起研究者高度的懷疑：具有中國認同傾向的台灣人，不管省籍身份，對於「中國人」或「中國認同」的身份認知存在一種「文化優劣」區隔，尤其是「種族主義」的價值評斷，而該想法或與他們從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有關，亦即過去他們覺得台灣人土俗，現在他們覺得大陸人土俗，因為根據研究者的經驗，在國民黨編輯的教科書中，這兩個地方的人民是比較缺乏文化素養及衛生習慣的群體。準此，接受這套教化的價值體系與符號系統的台灣人，通常帶著有色眼鏡觀看其他國家的文化，對於英語系或歐洲國家的評價，遠高於其他非白人國家，尤其是自己的台灣同胞或是想像中比較落後的東南亞、非洲國家的人民。再者，假若該歧視者也有遭受歧視的相同經驗，可能會有兩種極端的反應，其一是同情受歧視者，但也會無意識的表現出歧視性行為，只是情況比較緩和；其二是更為嚴厲的歧視別人，目的是強調自己外顯體徵與內在文明的差異，尤其是防止他人將之聯想為「同一團體」。研究者在訪談過程，曾聽一位原住民籍的受訪者非常強調地批評台灣本土化運動，認為這是對原住民再次的文化傷害，「因為國民黨已經把我們害得很慘了」〈F2 吳小姐〉，「現在民進黨，還想強迫我們講台語」，而她也對於「台客嚼檳榔及講台灣國語的樣子」深感痛惡。不過，或許是研究者的表情讓她覺察有異，她最後補了一句「我知道有許多原住民也這樣，但我就是

不喜歡，而且我家沒有這樣的人」。相同的觀感，當 F15 陳小姐講到生活周遭的大陸人時，亦認為他們是有差異的，「雖然我們家不是很有錢，但我們不像他們那樣貪小便宜」，結論是：「我們是台灣人，是中國人，但絕對不是大陸人」。

部份台灣人確實對於「中國」有一份情感，而對於中國人身份的認定，更有一種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中國」是經由「祖先」的手，交到他們手裡的印記，聯結整個家族記憶的文化傳承，無論如何是無法拒絕，也不能拒絕。雖然多數的受訪者因此在台灣本土化運動的認識偏向負面，不過，研究發現，其中情緒語言多於理性的思考，因為他們將台灣本土化的歷史不可逆趨勢與民進黨的無能執政畫上了等號，亦即如果 2008 年二次政黨輪替，一切將會全部改觀，即便無法在短時間內有所更動，兩、三年內也會在國民黨的改革中，慢慢恢復成他們熟悉的文化景觀。當然，也有另外族群的不同聲音，例如 M6 高先生就強調：「台灣是我的家，我從來就不是大陸人，中國人身份是沒辦法兒的事，我爸爸從那裡來，我能拒絕嗎？不過，我很堅定我的台灣人身份，如果兩岸真的打起來，到底還是會為台灣而戰」。F6 賈小姐也有類似的想法：「我們兩邊是不一樣了，這麼多年的間隔，發生那麼多的事，我們想法也不一樣，加上受的教育不同，價值觀也很不一樣，就算分分合合的歷史又把兩邊給聯在一塊，結果還是會分開，因為就是處不來」。不過，年輕一代的台灣人對於台灣成為一個國家的反應相對比較默然，即便他們逐漸認同台灣人的身份，但面對民進黨的貪腐與中國的崛起，也不得不調整這個國族認知，畢竟，「當個有志氣的台灣人，不如當個有前途的中國人，來的實際」(F10 黃小姐)。當然，這個認知或意見的背後存在許多問題需要討論，若以本研究為視角，這是長期受國民黨教化的結果，過去的威權統治隱含帝國及殖民主義思維，這種思維的基本作法就是將人民和自己的土地區隔開，虛擬一個遙遠但透過殖民者在受殖地的生活卻也真實的文化景觀，讓受殖民產生一種對於殖民者妒羨交加的心理，繼而將自己置於衍生性存在的位置，最後失去解放真實及創造本體動力的依附，亦是一種權力點到之處另生節點的霸權網狀，始終束縛

受殖者的身體與心靈。準此，若有人想要起身反抗，除受到殖民者暴力壓制外，也會受到同儕排擠或自己心理磨難，尤甚是外省人更有一種外於其他台灣人原鄉賦歸渴望。換言之，某種程度上，雖然部分的外省人也是蔣氏政權下的受害者，他們隻身飄零到台灣，面對老家回不去，新家不歡迎，語言學不會包括去除大陸方言的國語與日常生活需要的台語等苦楚，但他們對於部分台灣人的悲慘遭遇，仍然存在旁觀他人痛苦的漠然抑或既得利益的默然，畢竟，若不是中國境內發生內戰，他們永遠不會遇見這樣的一群人，也不會面對這樣殺戮情事。某種程度上，他們對於這類特定歷史事件的認識，具有時代精神與錯誤的共通性見解，甚而，部分外省籍的受訪者在轉述聽來的內戰衝突以及遠勝於此的慘狀後，認為台灣人應該感到「慶幸」，因為「那些年換來這些年的安定，確實值得」〈M5 胡先生〉，換言之，所謂「社會整體」的過去性及其必須聯通現代文明進程的共時性意義，或僅是經由集體暴力為特定的統治階級設計的歷史擬像，目的在聯結既定權力的文本敘事，將特殊事件詮釋為特定時間內必要的「共通特質」，繼而利用命定的「目的論概念」排除個別的，正義的心智模式解讀，因而，蔣介石退守台灣後的高壓統治成為必要的「時代錯誤」，跨越的、跳躍的、異時的歷史景致具有不證自明的「歷史連續性」，台灣當前的「文明成果」更證明當時鎮壓屠殺的正當性與必要性。這樣的論述並非將所有的外省人視為冷血族群，僅是以當時景況討論他們成為旁觀他人痛苦或既得利益者的脈絡，對於他們承受的歷史共業，研究者亦是保持「一步之寬」的詮釋循環距離，除了可以理解，亦深感同情。

比較不同省籍台灣人的國族敘事，研究者以為產生兩個啟發性意義，其一，過去慣以「外省人 = 中國人 = 較強的中國認同 = 傾向支持統一」的邏輯看待外省人的國族認同觀點，研究者認為這種論述或成可立，但必須加入「階級」的要素，並且連帶考慮其他具有相當社經背景的台灣人是否在相同「中國認同」的範疇，產生論點的聯通性，方有推論意義。換言之，以本研究發現觀瞻，相對於外省族群，社經背景較為優勢的本省人、客家人，通常也普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而且比之其他具有相同族裔身份的台灣人較具有強烈的中國認同，如果「獨立」與「統一」必需擇其一，亦與多數外省籍受訪者一樣，普遍傾向「支持兩岸統一」；其二，承其一結論，研究者發現具有強烈中國認同且在經濟、語言以及其他社會條件相當的外省籍、本省籍、客家籍受訪者，面對本土化挑戰時承受相似「雙重意識」的壓迫，對於「台灣是否應該成爲一個國家」以及「中華民國已不具中國代表權」的問題思考，亦有「雙重身份」的斷裂傾向，不過，原住民籍的受訪者並無這種現象通性。換言之，對於「台灣國族認同」或「台灣人身份」有所遲疑甚至強烈反對「台灣應該成爲一個國家」的族群，顯現一種外於 Eric Liu 的華人特質與國族認同的差異旨趣，某種程度上，亦是一種不願意妥協但又自爲結構的中國想像與發明。這個想像與發明是指一種台灣人自爲「中國人」與「台灣人」的身份認知，具有雙重甚至多重國籍的傾向，即便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前提，也難以認同自己經由「中華民國」及「大中華民族主義」所聯結的中國國籍已爲「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侵吞的事實，尤其是對於西方文明的傾慕，在難以決定國族歸屬的情況下，竟也顯現的自利趨勢，這或也證實以蔣介石及其追隨者爲權威設定的中華民國是以西方工業資本主義爲核心的殖民地主義，透過都市建設計劃與經濟生產模式構作而成的暫時性屬地，資源的掠奪與文明的建制或有長期獲利的機會主義意味，其中，「中華民國」的語境並非推翻腐敗滿清的新中國政權代表，而是不堪戰敗退守台灣的蔣氏王朝另外別名。準此，台灣變成「個人家國」的基地，甚至是與蔣氏政權交好的美國的另外殖民屬地，對於台灣歷史疑義或空白的追問成爲「破壞和諧」的麻煩製造者，質疑「主義」與「領袖」的思考成爲「多數民主的暴力」，更讓有心人士找到了模糊正義的出口，不過，無論怎樣的美化字詞，在經濟資本壟斷、社會文化滲透、國族身份認同等層面，乃至常民活動、文化景觀、語言符號等價值系統中，尤其對話歷程出現病態式的記憶否認，始終存在帝國主義殖民的、強加的、入侵的殖民化事實，而從台灣人身份游離到台灣主體文化及其認同的縫隙，或也看到國族覺知的反動真義。